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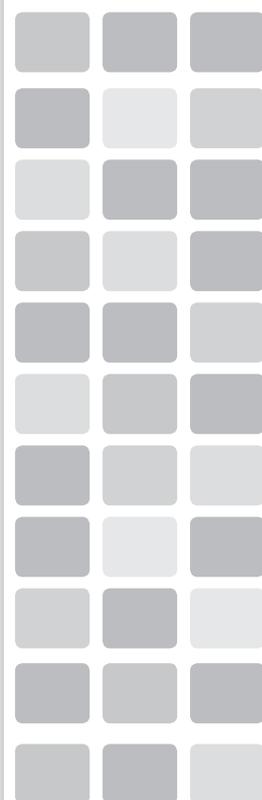
中国会计年鉴

第十部分

会计理论研究工作

ACCOUNTING ACADEMIC STUDY

中国财政杂志社



ACCOUNTING YEARBOOK OF CHINA

中国财政杂志社

2015年会计理论观点述要

一、企业会计准则研究

(一) 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与执行。

有学者继续对会计准则(2006)的实施效果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企业会计准则(2006)总体上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从各会计信息质量对比分析中发现,企业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可靠性的提高;在可靠性与相关性的对比上,多数审计师认可其质量提高,同时认为相关性提高的程度要弱于可靠性,这与公允价值使用的限制和难度密不可分。

有学者以SFAS115的影响为例,探讨了会计准则和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与非持有至到期证券相比,持有至到期证券对贷款的增加是负相关的,即持有至到期证券数量的增加会导致贷款数量的减少;与货币政策非紧缩时期相比,货币政策紧缩的时期持有至到期证券的负相关性更为明显,而且持有至到期证券改善了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

有学者通过以报表始发错报的多少来度量财务报告质量的高低,研究美国证监会对于加速公司申报期限缩短至60天的要求是否合理,公司能否依照萨班斯法案404条款的规定加强内部控制,从而在不影响财务报告可靠性的前提下,满足证监会的要求。研究表明:大型快速申报企业即使加速申报期限,其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也不会受影响;而快速申报企业的始发错报的概率增加,其财务报告可靠性降低,但是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只是暂时的。

(二) 具体会计准则研究。

有学者分别从股权性质、薪酬制度、管理层偏好和审计质量4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企业管理层在划分某项金融资产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另外,规模越大的企业,其政治敏感性也就越强,在划分金融资产的类别时,更易采用避免利润剧烈波动的方式。

有学者对研发费用核算和认定法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发现4个主要问题:会计核算不规范、主观性大;研发项目的财务管理不到位,缺少必要的内控制度;研发费用核算和认定法规口径不一、协同性差;中介机构缺乏有效约束,审查鉴证的监督作用较小。

有学者探讨了土地使用权的会计处理。对于土地使用权,现行会计准则是按照持有目的或用途不同进行分类核算的,除了计量属性的取舍问题之外,还存在以下问题:外购土地及建筑物支付的价款,在建筑物与土地使用权之间难以合理分配,全部作为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值得商榷;

土地使用权与知识产权本质上截然不同,将两者合并列示,易误导信息使用者做出错误的决策。因此,建议土地使用权应单独列报。

有学者探讨了资源型上市公司生态收益的会计计量问题。以西部矿业为例,明确生态收益的确认范围,即:企业生态收益=企业综合收益+企业行为带来的外部经济(收益)-企业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成本)。同时提出生态收益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应是会计报表主表与附注披露相结合。

有学者对企业会计准则中关键不确定性术语的理解进行初步研究发现:被调查者对每个不确定性术语的赋值存在差异,对有些不确定术语的赋值一致性较强,有的则较弱,表明对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关键不确定性术语存在理解差异;被明确定义的不确定性术语赋值的一致性显著地高于没有被明确定义的,表明对不确定性术语进行定义有助于增加对准则的一致理解;会计师对出现在不同准则情境中相同词汇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即使是同一术语,也仍然需要针对每个准则进行定义、解释。

有学者就采用XBRL格式的财务报告对基金市场有效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无论以任何基金指数作为中国基金市场的代理指标,采用XBRL格式财务报告均可以降低其对随机游走的偏离程度,即提高了中国基金市场的有效性。具体而言,其提升效果有所差异:采用XBRL格式的财务报告对上交所基金市场有效性的改善效果大于深交所的基金市场;对大盘基金和小盘基金的改善效果优于中盘基金;对成长型股票基金的改善效果优于价值型股票基金。

有学者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的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对财务报表可比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委托书发布的最初几年,财务报表的可比性下降;当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供的分类标准不完整、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分类标准分类时,公司的具体扩展分类越多的企业的财务报表可比性越低;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财务报表项目的可比性下降,而折旧的可比性没有改变。

(三) 会计准则国际协调。

有学者运用宏观经济数据就强制采用IFRS对股票债券市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外国债务的影响比国外资本投资的影响更显著、更强烈;但是,在采用IFRS之前治理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投资者保护程度更高的国家中,强制采用IFRS后外国股权投资的增加则十分有限。

有学者比较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的概念框架和日本概念框架 (ASBJ)。指出: 尽管两个框架都认可财务绩效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IASB 和 ASBJ 对此却有不同的概念。2010 年的 IASB 框架针对财务绩效采用了“全方位的可实现的净资产”的概念, 即只承认将可实现的资产和负债确认为收入和费用, 而 2006 年 ASBJ 框架采用了“净收益确定”的财务业绩的概念, 即收付实现制。

2013 年 IASB 完成了一般套期会计的修订工作, 并将其纳入 IFRS9 之中, 这标志着 IASB 推行的旨在以 IFRS9 完全取代 IAS39 项目的第 3 个阶段取得了重要成果。有学者从与风险管理实践协调的视角, 探讨 IAS39 套期会计存在的问题、梳理 IFRS9 一般套期会计相关改进, 剖析 IFRS9 一般套期会计仍面临的问题、分析 IFRS9 一般套期会计改进对我国产生的影响, 并为未来套期会计的改进提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二、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一) 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有学者以制度变迁的影响理论、经济后果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为基础, 根据会计准则变革的目标和相关经验证据, 界定了会计准则变革的预期效应与非预期效应, 构建了会计准则变革的非预期效应系统框架, 包括未实现的预期效应、后续间接效应、超出效应和事前效应 4 个方面, 分为微观非预期效应和宏观非预期效应两个层次, 并对未来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路和建议。

有学者对最近 20 年我国会计界渐渐兴起了“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记录和会计报告”的提法进行反思, 认为这种提法缺乏合理逻辑。会计确认其实就是“登记入账”之意, 包含会计计量。会计计量是会计确认的应有之义, 它并不是与会计确认并列的会计程序。业界所称的会计记录本意就是登记入账, 它也不应与会计确认(入账)并列。简单地说, 会计程序是指“审核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报表”, “记账、算账、报账”是对会计程序的精炼概括。会计循环就是周而复始的会计程序。

有学者探讨了财务会计理论发展必须突破的障碍及应当反思的问题。指出: 当前会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 其根源在于基于资产的交易观的约束。会计核算应当基于价值, 反映企业资源来源及价值构成, 负债、股东权益及剩余权益, 利润及全面收益, 企业能力构成及商誉价值, 提供完整的企业资源价值及运营效果信息。

有学者指出, 创业板上市公司负财务费用占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的水平较高的现象说明了传统营业利润并不能反应企业的真实业绩。基于此种情况, 构建了核心营业利润指标对业绩进行评价, 弥补了营业利润计算的缺陷, 拓展了经营业绩评价视角。

有学者就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可比性越高的上市公司通过银行借款进行融资时, 能够获得的银行借款的融资金额越大, 并且所享有的银行借款的利率也越低; 可比性越高的公司通过发行债券进

行融资时, 能够获得的债券融资金额越大, 并且发行债券的成本也越低。但银行借款的显著性弱于公司债券。

有学者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资本市场两类主要的会计估计变更伴随的盈余效应。研究发现: 公司的会计估计水平(即坏账计提比率或折旧率)背离行业正常水平的幅度越大, 公司越可能在下一期作出与行业水平趋同(而非背离)的估计变更; 与相对稳健的会计估计相比, 相对激进的会计估计表现出显著更强的行业趋同效应。这意味着, 公司管理层进行会计估计的自主空间受到会计信息可验证性和企业经济基础的制约, 从而在总体上趋于稳健而非更加激进。

(二) 公允价值研究。

有学者就公允价值会计是否能够提升资本市场的信息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银行业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模式的采用提升了分析师预测的离差程度, 却降低了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然而, 公允价值计量的层级披露却可以有效提升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 降低离差程度。相对而言, 采用第三层级公允价值计量(模型法)的模式导致了分析师预测的更高的离差程度和更低的精确度。因此, 模型法公允价值计量方式是导致资本市场出现噪音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从管理者与投资者两个方面分析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如何影响企业管理层和投资者的非理性心理, 进而探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运用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的机理。根据回归结果, 当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正时, 公允价值变动程度与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净利润的程度越高, 越容易引发投资者和管理者过度乐观的非理性心理, 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投资过度现象。

有学者就公允价值会计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1) 我国每股公允价值损益多于每股经常性损益, 并且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意愿较弱; (2)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 且反应系数同经常性损益与现金股利的反应系数几乎一样; (3) 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不相关。

有学者就公允价值的预测能力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公允价值模型的拟合优度显著高于历史成本模型; 交易性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对未来收益的预测能力要优于历史成本; 公允价值预测误差对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有负向影响, 即公允价值的预测能力对其价值相关性有正向影响, 而且交易性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随着公允价值预测能力的提高而增强。

(三) 会计稳健性研究。

有学者将成本粘性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剔除, 从而衡量更准确的盈余稳健性。研究表明成本粘性因素的确会混淆盈余稳健性的估计结果, 因而, 控制成本粘性的相关变量, 能增加盈余稳健性度量的准确性。进一步利用新修订的盈余稳健性的估计模型分析会计政策变更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会计政策变更降低了对盈余稳健性的要求。

有学者就管理层判断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准则赋予管理层判断越多，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低，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替代效应；这种替代效应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同时存在，但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我国新会计准则扩大了管理层判断空间，从而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水平，降低了投资者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然而，会计准则改革的这种效应因企业股权性质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有学者就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会计的非条件稳健性不存在负相关关系，会计管制的存在是可能遏制这种负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就并购行为与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与短期并购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而与长期并购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在治理机制设计相对较差的并购方，会计稳健性对长期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愈加明显。

有学者就会计稳健性对宏观经济指标与货币供给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由美国经济分析局编制的各年度公司总利润和国内生产总值对汇总的负面新闻比正面新闻更加敏感；公司层面的会计稳健性可能通过改变美联储所依赖的国内生产总值测量来影响联邦基金利率决策。

有学者就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会计稳健性对资本成本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债务资本成本都是显著负相关的，即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的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越小。股权分置改革后，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增强了，但并不显著；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资本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增强。

有学者就代理冲突、股利分配和稳健的财务报告对股权持有者的直接好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越明显时，稳健性与股利支付之间的负向关系越显著；只有对于外部监管较弱的企业，稳健性才与股利支付呈现显著的关系；当企业剩余现金流较多时，稳健性与股利支付的关系更显著；对于非家族企业来说，稳健性与股利支付显著负相关，而对于家族企业不成立；与有投资级债券的企业相比，具有投机级债券的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与股利支付更相关。

有学者在考察企业不确定因素对分析师盈余预测产生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和检验企业会计稳健性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不确定因素的增多会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和预测分歧度的增大；公司在预测年份里的会计稳健性总体上有助于降低不确定因素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不利影响。

(四) 价值相关性研究。

有学者研究公允价值层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公允价值层次信息整体上具有价值相关性；随着计量层次的降低，一、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资产的价值相关性逐渐降低，而一、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负债的价值相关性没有显著差异；不同信息环境下公允价值层次信息价值相关性

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较高的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丰富度能提高第三层次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有学者就民营上市公司政治联系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治联系显著增强了会计盈余与股票超额回报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其盈余信息含量更高。地处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民营上市公司，政治联系的这种促进盈余质量的作用相较于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公司而言显著更弱，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环境调节了政治联系与盈余信息含量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就会计-税收差异、暂时性会计-税收差异及永久性会计-税收差异与公司未来盈余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税收差异、暂时性会计-税收差异与公司未来盈余增长显著相关。构建的投资组合能获得显著超额收益，市场对会计-税收差异信息存在误定价，这种投资者认知偏差是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市场异象”。

三、财务呈报与会计信息研究

(一) 盈余管理研究。

有学者就风险投资的“逐名”动机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IPO后长期业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在IPO后的盈余管理程度要显著高于无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配合减持需要、创造有利退出条件是重要原因；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其IPO后长期市场业绩要低于无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并且IPO时盈余管理程度越大、IPO后的长期业绩也越差。

有学者就企业的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是否会影响其盈余管理程度，以及由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决定的那部分预期盈余管理是否会影响到外部审计师的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由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决定的预期盈余管理显著影响了审计师关于审计意见、审计收费的决策。

有学者就企业战略定位对会计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与会计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正相关，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负相关。在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中，战略差异度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正向作用有所减弱。

有学者就政治成本对于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PM2.5爆表”事件后，相比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进行了显著向下的盈余管理；该结论在小规模企业或者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有学者采用文本分析法，在有效识别“诚信”导向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其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那些以“诚信”作为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盈余管理水平更低；同时，无论是对于正向盈余管理还是负向盈余管理，“诚信”都能发挥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以及在企业有再融资需求时，“诚信”发挥的作用更大。

有学者研究 IPO 公司盈余管理问题,考察面临着不同现金流约束和会计业绩约束的 IPO 公司会如何进行开发资本会计政策的隐形选择。实证结果表明:公司 IPO 前的会计业绩越高,开发支出资本化的概率越低;在同等业绩水平下,现金流约束越大的公司,资本化开发支出的概率更低;资产负债率对公司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控股公司中。

有学者就公司 IPO 盈余管理的路径进行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同时通过会计应计和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达到提高发行价等目的,监管方需要对此提高关注;盈余管理具体路径包括放宽信用政策提前确认收入、缩减各项费用提高利润和关联交易降低产品成本等方式。这些盈余管理行为使公司偏离正常经营活动,并会对公司未来发展与规划造成不利影响。

有学者就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性别和学历差异会导致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董事长、总经理任职时间差异则有助于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而董事长、总经理年龄差异则不会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

有学者就中国上市公司增发前分类转移与由此产生的核心盈余异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针对增发公司业绩门槛法规变化,公司公开增发前分类转移增强,可操控应计盈余管理减弱,核心盈余持续性下降,核心盈余异象增强。这表明,公开增发业绩门槛变化使公司偏好以分类转移方式虚增核心盈余,从而改变核心盈余结构,引起核心盈余持续性下降,进一步造成投资者高估公司未来价值,导致核心盈余异象。

有学者就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退市新规出台之前,主板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高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而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的盈余质量在多数年份上并无显著差异。主板上市公司倾向于向下盈余管理,创业板上市公司倾向于向上盈余管理,而中小板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向不太明确。

有学者就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如何影响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及其关键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管理层预期公司盈利小于行业盈利,正向盈余管理与宏观经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表现为顺周期特征,当企业面临产品市场竞争压力越大,其正向盈余管理的顺周期性特征更显著。这表明,预期公司盈利与行业盈利差异及产品市场竞争压力是公司在经济繁荣阶段向上操纵利润的关键机制,因此结合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公司面临市场竞争程度对理解其盈余管理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有学者就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方式与审计治理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为了实现机会主义,不仅通过应计盈余管理方式,并且还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方式;真实盈余管理因其依托于真实活动决策,审计师对其有更大范围的“容忍”,相应地,发生审计师变更的概率更小。

有学者就我国上市公司是基于因行业发展的需要而将研发支出费用化,还是利用研发支出费用化进行盈余管理

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将公司分为“两年及以上均发生研发支出费用化的公司”以及“只有一年发生研发支出费用化的公司”两个大类。第一类公司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即第一类公司研发支出费用化的行业发展动机较强,第二类公司较弱;第一类公司的高盈利居多,第二类公司没有统一的特征,存在高盈利和大亏损两个极端,有盈余管理的迹象。

有学者就证券分析师覆盖对上市公司真实活动操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就总体而言,分析师在上市公司真实活动操控中主要扮演着过度压力提供者的角色,即分析师覆盖人数更多的公司的真实活动操控强度更大。

(二) 财务错报与重述研究。

有学者以中概股危机为背景,研究 SEC 意见信对于财务造假的预测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收到 SEC 意见信的企业,收到意见信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问题公司;SEC 意见信提出的问题数量越多,解决难度越大,企业越有可能成为问题公司。这项研究对于帮助投资者理解如何解读 SEC 意见信,识别财务造假有重要意义,也为 SEC 制定合理的意见信披露制度提供政策性建议。

有学者建立了适合中国市场的更为可靠并且实用性强的财务造假预测模型。发现:其他应收款、是否亏损、经营应计项、现金销售率、股票换手率波动率、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是否再融资和股市周期是鉴别中国上市公司造假的关键变量;用这些指标建立的综合模型不仅具有简单易懂的实用性,而且在辨别国内造假公司的能力方面显著优于西方常用的 Mscore 和 Fscore 模型。

有学者研究了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形成路径。研究发现:(1)并非所有的风险因素都对重大错报风险构成直接影响,但是风险因素之间存在着传导关系,外部风险因素会通过内部风险因素的影响而改变风险后果的大小;(2)各因素对重大错报风险影响的关联性与定性分析相一致。

有学者就地理邻近对上市公司会计错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与证监局之间的地理距离正向地影响着公司发生错报的概率;媒介环境对于二者间的关系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即良好的媒介环境有利于上市公司与证监局之间的信息传递。

有学者就财务重述、年报披露及时性与股价波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务重述公司的年报披露及时性低于非财务重述公司的年报披露及时性;财务重述能够增强及时性对股价波动性的负向影响作用,而且这种关系在 IDR 公司中比在 IIR 公司中更为明显。

有学者就公司与客户共享审计师能否降低财务重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主要客户共享审计师能够显著降低公司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尤其是降低与销售相关事项的财务重述;与来自不同地域的共同审计师相比,来自同一地域的共同审计师更能显著降低公司的财务重述;共享审计师效应与公司及其客户是否来自同一行业无关,而与公司其他监督机制的强度显著负相关。

有学者就高管是否利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非财务信息来为其盈余操纵行为做掩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一个动机是为了隐藏盈余操纵,进行盈余重述的

公司会披露更多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非财务信息；盈余操纵与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关系在隐藏动机较大的公司当中更强。

(三) 会计信息质量研究。

有学者就主并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否增强并购后股东的长期财富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可比性增强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主并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并购后股东的长期财富效应显著正相关；并购导致主并企业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且增加的程度与并购后股东的长期财富效应显著负相关，但主并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抑制了不确定性增加的程度，从而有利于并购后股东长期财富的提升。上述结果表明，主并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在并购的价值创造中发挥重要作用。

有学者就大股东控制对会计剩余控制权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剩余控制权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会计剩余控制权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大股东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会计剩余控制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大股东控制程度越高，会计剩余控制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

有学者从理论上总结了现代财务会计造假的手法或规律。指出，财务会计造假的原理，是在等式“资产+费用=负债+业主权益+收入”的等号两边“同增同减”。这就充分揭示了：表面上完全正确的公式，实际上暗藏着允许会计造假的漏洞。在一些虚假的、似是而非的理由的配合下，“未分配利润”是完全可以随意虚构的。

有学者将会计舞弊动因理论作为切入点，分别从社会心理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机理研究进行了综述。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明确会计舞弊的形成机理，发掘会计舞弊的影响因素，以此提出有效的会计舞弊治理措施，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

有学者研究了循环的内部控制审计是否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得出的结论是：公司在采用循环人员配备模型来实现内部审计职能时应该考虑潜在的成本，如果采用这种模型，应该确保恰当的补偿性控制来降低这项成本。

有学者从审计师的视角评估了家族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通过建立不同企业所有权类型的审计收费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的审计收费比非家族企业低8%，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财务报告质量。

有学者就财务报表质量对股票特质波动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务报表质量越差，异质信念对特质波动率造成的正向影响越大；财务报表的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高成长性公司和股票历史收益较大的公司，且盈余管理较大时对财务报表质量的影响更加明显。

(四) 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有学者就信息披露行为对资本市场估值偏误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对其内在价值的偏离程度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信息披露修正资本市场估值偏误的主要途径，是降低市值高估公司的市场价值泡沫。

有学者探讨了信息披露监管与会计报告中的非对称性。指出，有意提高其公司的市场价格的知情经理人对信息披露规则提出的需求，公开披露规则实际上是对经理人的集体需求做出的回应，信息披露规则的形成是一个政治妥协的过程。由于不需要追求市场平均价格，这种规则对于报告低于中位数事件的公司以及模型属于政治少数群体的公司来说，通常成本是十分高昂的。因此披露规则可能会损害少数无组织利益集团或群体的利益。

有学者探讨了综合收益信息的列报和应用问题。综合收益被认为能够克服传统净收益报告模式透明度不高、业绩信息不全面的缺陷，更有助于实现会计目标。但当前综合收益信息的运用程度仍然十分低，远未达到准则制定者所期望的水平。

有学者就公司的财务披露和支付给CEO和CFO的奖金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以及影响该关系的条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和CEO和CFO的奖金变化显著相关。这种关系在具有较高的销售增长和较强的企业治理的公司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说明，董事会将与投资者沟通作为重要的CEO和CFO的价值增强责任，而且投资者沟通在高成长企业和具有更强治理结构的企业更重要。

有学者研究了政治压力与信息披露改进的关系。分析发现：政治责任并不一定意味着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准则的出台。相反地，过多的政治责任则会使准则制定过程演变成一个准则制定的循环怪圈，尤其是期待高水平的信息披露的准则制定者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时，这种循环怪圈更是经常发生。

有学者就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得越多越详细，分析师跟踪数量越多，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越大；上市公司或有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与明星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显著正相关，与非明星分析师的预测精确度无显著相关性。

有学者就创新行为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提升企业价值方面，创新行为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贡献度普遍大于强制性信息披露水平；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认同方面，结论相反；在提升外部融资能力与降低代理成本方面，创新行为信息披露水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新行为信息披露有效性有待提高，基于累积创新链与降低创新隐性成本需要，应加强创新行为的中间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基于创新行为的行业特征，应加强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分行业信息披露制度建设。

有学者就我国新三板市场会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新三板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存在以下问题：(1) 会计信息披露不规范、不充分、不及时；(2) 新三板市场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比较笼统，主要是股转系统发布的自律性、指导性规则，并且这些规则没有考虑挂牌公司的个体性差异，信息披露规则有待完善；(3) 挂牌企业公司治理不完善，普遍不按照规章制度决策，股权过度集中，三会无法起到应有作用；(4) 外部监管有待加强，关于违规披露的相关法律存在不完善之处。建议监管机构一方面要

以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原则管理新三板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定适合不同层级挂牌公司的信息披露标准,坚持强制性信息披露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相结合,完善信息披露规则;另一方面在监管时放宽事前监管,加强事后监管,严惩未按制度要求披露信息的挂牌公司。对于挂牌企业,建议应按照规定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通过企业、推荐券商等多方努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主办券商,应严格履行对挂牌企业的持续督导责任,相关各方也应加强对主办券商督导责任的监督。

四、会计研究新领域

有学者就大数据时代的会计变更进行探讨。(1)大数据带来的会计信息化颠覆了传统会计职能。传统财务会计重在回顾过去和对内报告,大数据时代改变了这种职能,更多地发挥会计的管理控制职能,使得会计从业人员更多的进行企业经营决策、管理和价值创造服务。(2)信息化背景下财务人员的分类和转型。互联网、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使得财务人员转型定位,专业化分工更加明细,主要向基础财务(为企业提供最基础的财务数据信息)、业务财务(利用已形成的数据和财务知识为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财务分析、投资分析等专业服务)和战略财务(负责项目分析、风险控制、绩效考核和业绩管理等)方向分流。(3)财务人员定位及职业发展规划和设计。在大数据背景下,财务人员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无论是提供共享信息的基础会计服务人员,还是提供共享服务的管理会计人才。第一种人才,在共享服务中心及财务外包模式下,每个财务人员只需完成整个账务处理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是一种事务性处理功能为主的服务。而第二种人才,他们的工作重点转向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为各部门、各业务单元提供专业的财务建议和支持。(4)管理会计素质培养。应从专业技能、全局事业、个人素质三方面展开。

有学者就石油物探企业成本动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物探项目的测量公里数是测量作业成本的主要成本动因,物探项目直接成本的变动与测量点个数关联度不大;钻井作业累计深度是钻井作业的主要成本动因,打井数量和打井深度对项目直接成本产生影响;采集面积是影响采集作业的主要成本动因,对施工成本产生主要影响,采集炮数对项目直接成本的影响不大。根据以上3点结论,企业在进行成本管理和项目成本预测时,从物探项目施工的三大作业入手,重点考虑三大作业的有效成本动因,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成本预算,提高项目工作效率,继而降低项目成本支出。

有学者就环境成本与GDP有效性进行研究,认为首先要识别“无效GDP”,然后启动“环境成本会计”,以环境成本为基点,循序渐进,建立和形成“环境成本数据流”,水到渠成汇总测算绿色GDP总量。

有学者就传统文化、环境制度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制度及传统文化分别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同时传统文化与环境制度有互补效应。

有学者就社会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舆论压力、制度压力以及社会声誉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企业面临的政府压力和信贷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提出建议:(1)加强以政府为主导、舆论与企业自身三位一体联动的监管机制建设。政府应当设置环境责任推进机构负责企业环境责任的落实与宣传,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应当建立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金融机构应当加强监管,另外企业自身也应当完善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监督机制。(2)建立环境会计体系,规范环境信息披露标准。现阶段应确定以强制披露为主、自愿披露为辅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明确规定披露内容。

有学者就会计理论和制度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系统应用——澳大利亚水会计准则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进行探讨。作为全球第一个“水会计”准则,其特点是以体积为计量属性,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用复式记账法,编制3张水会计报表:水资产负债表、水损益表和水流量表,来描述、记录和披露重要地区水资源的增减变化,并实施水审计来保证水会计报告的质量。

有学者就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动因及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责任缺失情况越严重的企业,其盈余持续性越差;社会责任缺失情况越严重的企业越容易利用更多盈余管理进行利润操纵,并且倾向于选择应计项目利润操纵与真实项目利润操纵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社会责任缺失的企业由于弥补负面效应而产生更多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致使营业总成本升高,进而使得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即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情况越严重,企业财务绩效越差;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使得投资者的预期回报率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更高。监管机构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减少制度和监管漏洞,促进对社会责任缺失的信息披露,并加强企业和公众对社会责任缺失经济后果的认知,引导企业进行自我约束。

有学者就资源型上市公司生态收益的会计计量进行案例研究发现:西部矿业具体的环保措施在增加企业生态支出的同时带来了经济利益的流入,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报告,发现企业生态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渗透到了企业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举措中,生态支出是与一定的生态收益相配比的,企业的行为可能会对生态产生正的生态影响(收益),也可能可能会对生态产生负的生态影响(成本),最终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生态收益计量工作的开展,关键是要确定企业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提出了如何合理量化生态收益各项目并确定其会计计量模式、逐渐由表外披露转向表内呈列的迫切性;提出在评估企业行为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的基础上,计量企业生态友好行为对企业收益的影响,既反映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核心竞争力,也为企业的受托生态责任提供参考依据;对完善企业生态收益的会计核算制度提供对策与建议。

有学者就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案例进行国际比较研究。(1)从信息获取成本角度来看,国外企业往往采用专

门报告的方式单独披露社会责任成本,信息成本小;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成本信息则分散在不同报告中,信息成本高。建议在企业财务报告体系中,构建专门披露社会责任的报告体系。(2)国外采用货币与非货币相结合的形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而我国采用文字叙述形式。建议可用数据计量的信息优先采用会计基础型方法反应。(3)国外有完善的法规和监管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监管;我国缺乏法律约束和财政监督体系。建议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会计准则和制定并加强财政等部门的监督职能。

有学者就媒体关注与政府部门财务管理控制信息披露进行研究。(1)媒体关注政府部门财务活动管理控制的动因:一是为了媒体的使命和责任,不仅要提高媒体的影响力,也要主持正义和社会公正;二是媒体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过分揭露政府部门经济活动的阴暗面。在现实中,两种动机往往交织在一起。(2)媒体关注的政府部门财务管理控制信息的焦点及需求目的。当前,媒体报道频次最高的是“三公”经费,其次是对贪污腐败、虚假发票和突击花钱的曝光。其信息的外部使用者主要包括立法机关、审计机关、债权人、供应商等;内部使用者主要包括上级部门和公共部门内部的管理者。(3)媒体关注对政府部门财务管理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媒体治理既可以发挥监督效应,也可以发挥激励效应。媒体关注对政府部门财务管理控制信息披露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4)政府部门需要构建积极的、系统化的财务管理控制信息披露模式来应对媒体的关注。系统化信息披露模式的起点是确定信息披露的目标,具体的要素则包括政府部门财务管理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政府部门财务管理控制信息披露的程序、政府部门财务管理控制信息披露的渠道和形式以及信息集成和披露技术的优化。

有学者就司法会计技术介入职务犯罪侦办一体化模式进行研究。司法会计侦办职务犯罪的一体化模式是通过建立管理、沟通、协调、配合的机制,把职务犯罪侦查、惩治、预防一体化有机整合,明确职责,实现惩治职能的最优化和效果最大化。这种模式归纳为3种:一是侦查和惩治相互参与式,二是惩治和预防相互融合式,三是预防和侦查相互介入式。而形式具体可分为2种:一是开展宏观层面的技术调查,二是开展微观层面的技术支持。在具体实施时要注意:一是人员的身份,二是人员的角色。

有学者就我国政府债务会计信息披露与改进提出建议。要建立健全与政府债务管理目标有效契合的政府债务会计体系,进而完善政府债务核算制度,具体包括厘清政府债务类型及特点,根据债务管理目标合理选择确认基础,适当采用多种计量属性等具体要求,为全过程、全方位地动态跟踪反映政府债务管理提供保障,最终完善政府债务会计报告制度,实现表内外信息的有机结合。

有学者就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编制难点进行研究。关于政府会计主体的分类问题,应该依据这些会计主体自身的特点进行分类。因此,纳入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会计主体应当包括:由财政提供全部或部分运作经费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以及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特别是由政府投资的各种融资平台会计主体。关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合并

抵销问题,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内部抵销事项具有复杂性。(1)抵销事项会计主体除3类主体外应包括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2)抵销事项内容应增加内部投资和内部交易。内部投资是指政府、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对融资平台或国有企业股本金的投入。内部交易是指政府、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通过交易行为获得融资平台或国有企业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或服务的行为以及国有独资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3)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级次多,从而导致各级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抵销事项难以在本级财报抵销完毕。关于融资平台问题,融资平台具有职能、经营目的、债务以及会计核算的特殊性,导致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脱离关系困难、财务信息混乱、偿债责任难以界定等问题出现。建议:(1)关于账目清理问题。设计初次执行的政府会计准则时,应要求融资平台在特殊业务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按照地方政府债务界定标准,对成立以来的账目按照制度的要求理账、调账。(2)自营业务与政府项目报表的分离问题。应满足相应4项标准后才能“嵌入”政府综合财务报告。(3)关于报表对接问题。在融资平台编制的政府项目资产负债表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之间增加一张“转换报表”,对报表核算项目进行调整。(4)关于合并抵销事项,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形成3类特殊经济交往问题,应特殊处理。

有学者就政府公共基础设施会计计量与报告进行研究。认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是由政府部门占有并直接负责维护管理、供社会公众使用的工程性公共基础设施资产。公共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实物资产,和固定资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1)公共基础设施与固定资产均为固定在某处的、有实物形式的资产。但是公共基础设施较固定资产的用途更单一、更特殊——供社会公众使用,范围更狭窄——“工程性”的建筑或设备。因此,只有符合以上定义和条件的有形资产或固定资产才能够被确认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的范畴。固定资产与公共基础设施定义上的差别表明了政府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公共基础设施资产能够为政府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有用的会计信息、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减少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建议以历史成本法为基础计量公共基础设施的入账价值,并结合其融资方式确定具体的核算范围,按照政府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的特殊性将其分为可折旧资产与不可折旧资产确认后续计量的方式。(2)应该建立资产保管制度或受托制度,并发布资产保管报表或受托报表。在权责发生制下的“政府综合财务报表”中,单独披露包含了政府公共基础设施资产非财务信息的资产保管报表,用来补充综合财务报表中这几类资产的财务信息,以提高政府综合财务报表的会计信息质量。

有学者从成本会计视角提出了公用事业产品定价的对策建议:(1)科学合理确定产品成本核算的对象、项目、范围,为定价奠定重要的数据基础;(2)对产品成本进行全过程管理,为产品定价提供有力的制定依据;(3)引入多种归集分配方法,使产品成本核算和定价更精确;(4)加强成本审核,使价格管理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5)建立标准成本制度,成立标准成本管理委员会;(6)将成本控制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业绩考核标准。

有学者就商誉会计进行研究。认为,商誉是企业自身经营形成的、能够给企业带来超额利益或者损失的无形资产或者无形负债。既然把正商誉理解为无形资产,那么负商誉就应当作为无形负债进行确认,而不应再将其作为费用、对资产进行冲减的会计处理。商誉与一般商品一样,应该具有交换价值与在用价值。商誉外在表现形式取决于企业整体价格与净资产公允市价之差,其内在价值来源于企业自身经营。因此,商誉价值具有内在价值(即在用价值)和外在价值(即交换价值)的两种价值特性。商誉计量应该与商誉的价值属性保持一致。若反映企业整体资产的市场价格,应该采用总体评价法计量商誉的交换价值;若反映企业资产的在用价值,那么就应该用现值计量,即采用收益现值法。商誉=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所有者权益会因股价波动而变动。因此,会计方程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商誉是客观存在的,商誉价格随股价波动而波动。因此,现行会计制度不认可自创商誉计量的根本原因是维护会计等式平衡性。商誉与会计方程密切相关,会计方程若保持平衡,则没有自创商誉;会计方程若不平衡,则产生商誉。实践证明自创商誉客观存在,则说明会计等式必然不平衡。会计方程不平衡性,将会导致复式记账理论基础塌陷,由此就会产生市价三维动态计量模式的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市价三维动态计量和自创商誉计量提供了可能,将迎来一个伟大的会计变革时代。

有学者就品牌会计研究进行述评及展望。从品牌会计确认、品牌会计计量、品牌会计报告及其经济后果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由于品牌内涵呈动态演化状态,理论界对品牌概念内涵界定不清,因此学者们在确定会计确认对象时产生不同认知。品牌确认经历了由合并确认到单独确认再到合并确认的过程。在合并确认中,现行会计准则不允许确认自创商誉,将自创品牌排除在会计系统之外。在单独确认中,传统会计理论的桎梏和人们对会计确认标准认知的局限将品牌资产排除在会计系统之外。对于品牌会计计量,其核心是确定品牌资产的价值,主要以评估方式确定。因无法合理确定品牌的价值,因此将其排除在会计系统之外。在尝试对外报告的过程中,品牌会计信息主要是量化的信息,在财务报告中披露有限。已有研究发现,品牌信息与股票回报、预期盈利能力和融资成本存在相关关系。品牌会计现有研究中存在诸多局限性,受限于计量困难、传统会计理论等桎梏而尚未报告品牌会计信息。但随着品牌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以及利益相关者对品牌会计信息需求的不断增加,在剖析品牌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环境条件下,构建品牌会计理论框架、明确品牌会计确认标准、探寻品牌会计计量方法等将成为品牌会计未来关注的重点。

有学者就新常态下浙江省的会计管理与服务进行探讨。浙江省财政厅采取了以下4项措施:构建一个仓库、提升二类服务、促进三项创新、实现四大转变。当前的信息不能真正反映全省会计人员的现状,无法充分发挥会计人员信息数据作用,通过实现与工商、税务、银行等政府部门的数据共享,既可及时完善会计人员信息数据,又可打破部门信息

“孤岛”,大大降低行政成本,为诚信政府、阳光政府建设提供基础数据支撑。财政部门的会计服务对象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和会计人员,因此,提升两类服务指的是提升对单位的服务和提升对会计人员的服务。三类创新指的是创新会计队伍建设、创新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服务财政中心工作。要实现的四大转变分别为加强工作协同,实现分散型向合力型转变;探索会计信用体系建设,实现无用型向信用型转变;探索会计管理信息大平台建设,实现孤岛型向共享型转变;稳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实现指定型向公开型转变。

五、成本管理会计研究

(一)成本管理会计与业绩。

有学者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管理者激励机制,研究相对业绩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相对业绩评价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3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未来关于综合业绩评价理论的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1)管理层薪酬界定与薪酬激励;(2)可比公司的选取范围;(3)相对业绩评价的经济后果。

有学者就目标成本特性和新产品开发流程对成本降低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设计流程的性质(并行NPD或顺序NPD)能缓和目标成本特性和成本降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顺序NPD(低不确定性)情形下,分配特定成本目标的设计组比分配一般成本目标的设计组能够降低更多的成本,而在并行NPD(不确定性高)情形下,成本降低绩效在特定成本目标组并没有比一般成本目标组表现更好。证明了目标成本作为成本控制方法的效用边界条件。

有学者研究不同创新模式下的管理控制系统。结论是:(1)灵活交互式的控制结构能够有效推动企业创新,但相比于开发型创新模式,交互杠杆在探测型创新模式下更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2)诊断杠杆在开发现有市场和科技创新方面更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绩效;(3)在探测型和开发型企业创新模式下,各个控制杠杆对企业管理起到控制独立补充作用,非必要互补作用,尤其在开发型企业中,边界杠杆和诊断杠杆对企业绩效的作用相互独立;(4)无论在探测型还是开发型模式下,企业均需要平衡诊断杠杆和交互杠杆的应用,否则会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有学者从管理会计的本质特征、历史演进、理论与方法3个方面,讨论管理会计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系。(1)管理目标、组织架构以及内外部环境与管理会计方法具有共生互动性。管理会计的未来发展应从确定经营目标和管理重点入手,在此基础上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管控技术和方法,以有效应用完成目标实现进而创造价值的终极任务。(2)在组织管理的全过程均体现了管理会计的作用。(3)基于组织层级构建管理会计内容体系。当前,管理会计在企业中实际应用的普及程度较低,管理会计的相关理论和企业的实际操作之间衔接较弱是其应用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之一。(4)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与行为科学相结合,是管理会计应用与发展中应当重视的两个方面。

(二)成本管理会计与预算管理。

有学者研究计划与绩效评价双重任务下协商式预算的运用。当上级有额外的计划任务时,下级在预算协商过程中和协商之后都表现出更强的合作意愿;增加了上级的计划任务后,下级不仅会提供更多的初始预算方案,而且下级的绩效在协商之后也有了提升。当下级得知上级只能为双重任务制定一个预算方案的情况下,这种效应会更加明显。

有学者针对企业预算管理提出了9条相关的理念,用以指引企业做好预算管理方面的相关工作,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战略、目标与预算相协调的理念。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战略管理,包括如何制定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以及其实施方案。而战略规划的实施和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目标管理和预算管理为支撑。(2)先“可持续”后“增长”的理念。面对激烈竞争,许多企业将可持续增长作为一个重要理念。在预算管理中,应按照先“可持续”后“增长”的理念进行经营决策。(3)长期与短期既统一又对立的理念。企业管理者应具有战略意识,正确处理好短期业绩与长期成长性之间的关系。(4)做大与做强既统一又对立的理念。企业管理者应正确认识“强”与“大”的关系,预算管理,应本着以做强为基础,兼顾做大的原则。(5)动态与权变理念。预算管理是基于预期的管理,企业管理者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6)差异化理念。在预算管理中确立差异化理念主要应当做好战略目标定位的差异化 and 战略资源规划的差异化。(7)系统整合理念。树立系统整合理念,不仅需要做好预算管理治理功能与管理职能的融合,还需要做好预算管理系统与其他管理系统的整合。(8)以人为本的理念。企业预算管理,要体现以人为本。(9)全过程优化理念。做好预算管理,关键要做好事中和事后两个环节。

(三)成本管会计与激励。

有学者就管理层在面对不可控负面事件时是否以及如何运用其自由裁量权来调整员工绩效奖金进行研究发现:未来不可控负面事件的可能性会影响经理用奖金调整决策来激发主动性的方式。在存在绩效奖金的情况下,未来不可控负面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较低时参与者做出酌情调整的倾向显著高于不可控负面事件发生可能性较高的时候;参与者更倾向于在不可控负面事件发生可能性低、不存在绩效奖金的情形下做出酌情调整;参与者酌情调整的意愿受到其对于纯粹客观的系统、可控性原则以及评价精准度的一般态度的影响。

有学者就企业上市是否降低了生产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生产效率在IPO之后显著下降;上市公司长期生产率低于非上市公司;管理者激励、信息披露激励以及发明者激励均显著影响IPO后的生产效率降低行为。

有学者就管理层津贴的消费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私营企业津贴消费比国有企业更高,津贴消费与企业增长率正相关,与企业规模负相关。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20%低于50%的企业,津贴激励效果占主导地位,合理使用管理层津贴的可能性更高;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的企业,所有者和管理层之间的传统代理问题突出;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50%的企业,大股东直接

参与企业经营并严格控制企业管理。后两种情况下,津贴激励作用降低。管理层津贴具有激励作用,津贴消费是合理的。

(四)成本管会计现状与发展方向研究。

有学者研究国际管理会计最新发展及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建议:尽快研究和建立中国管理会计师资质考试认证制度,为社会提供合格管理会计师;明确职责分工,尽快建立起“考培分离”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利用和发挥各部门资源优势;组织专业人员加快研究管理会计师能力框架,在此基础上编写培训教材,实现规范化、标准化教学和培训;以国家会计学院为依托单位和教学平台,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一步扩大管理会计研究、宣传和培训的力度;加强组织和协调,努力形成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教学培训机构、出版商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有序推进。

有学者对管理会计的定位、理论体系构建、实际变革进行研究。管理会计应是一种为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等组织内部管理提供服务的信息系统。管理会计以价值为基础,以战略为导向,以服务组织内部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等活动为目的,组织整体信息和内部构成单位信息、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历史信息和未来信息并重的信息系统。管理会计变革,应在会计学的框架内进行,重点考虑管理会计报告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有学者对企业引进管理会计方法的排斥问题进行案例研究。以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出山推公司向日本合资伙伴学习管理实践和相关管理会计方法,以及为克服排斥效应而开展的后续变革。

有学者研究动态风险管理会计的兴起与发展。动态风险管理会计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将发展为整个会计处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中国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日益复杂;(2)会计准则制定部门的参与及应对;(3)我国会计人员的参与及应对。

有学者研究管理会计在企业应用的制约因素及其应对。(1)财务人员观念的转变。(2)财务信息系统的支撑。(3)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

有学者研究AICPA和CIMA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以《全球管理会计原则》为主,对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新进展进行详细分析。《全球管理会计原则》是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研究及建设的新突破,我国对其合理成果进行借鉴并消化,从而指导我国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建设、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及管理会计应用实践,尽快建立起中国特色管理会计体系,从而提高我国企业在新形势下的管理会计的决策能力,推动我国企业的转型及持续发展。

有学者研究精益环境下管理会计实证研究中的权变机理。根据国内外现有关于权变理论的精益会计实证研究,按照环境要素、管理会计要素以及经济结果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研究路径,试图梳理出一个逻辑框架,即精益技术环境对管理会计系统的影响、管理会计系统对精益技术的业绩效应、精益技术对管理会计系统的业绩效应以及其他环境因素对精益技术的业绩效应,以便得以将权

变精益会计中的实证研究加以分类,并评价各种理论关系的支持程度。

有学者研究中小企业管理会计研究现状和未来研究方向。认为:(1)新兴经济体国家管理会计应用研究较少,这些国家中小企业是否适用管理会计系统,其应用特点与其他国家有哪些异同;(2)在中小企业中,中型企业结构复杂,并大规模使用管理会计,除了资源限制以外决定企业是否使用管理会计的因素还有哪些,阻止中小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因素有哪些;(3)中小企业如何将原本为大企业设计的管理会计技术改造并适用于自身,对管理会计信息要求有何特点,在实务应用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及如何解决;(4)企业如何培训管理会计相关人员,在中小企业推行管理会计时会面临哪些困难;(5)中小企业如何适应业务网络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管理会计规则,如何克服应用这种规则并获得收益。以上这些问题有待进行更加深入广泛调研,推动中小企业管理会计应用不断发展。

有学者研究作业成本法的发展问题。从作业成本法的传播过程来看,可能任何一项管理创新的传播都要经过萌芽、理论形成与普及、应用与推广、沉寂与反思等多个阶段,并在应用和推广阶段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不过,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较为关心管理创新传播的影响因素,更多从权变视角进行考察;部分学者研究了新理论的采纳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这与效能选择观是一致的,但从时尚观、流行观等角度进行的研究较为少见。

有学者研究作业成本法与标准成本法的结合应用,提出标准作业成本法。分析发现:作业成本法与标准成本法并不互相排斥,作业成本法要发挥最大的功能,必须引入标准成本法的思想,使作业标准化。标准作业成本法吸收了两种方法的优点,使二者的优势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在准确核算成本的基础上,规范作业管理与定价,增强企业成本控制能力,明确责任,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和竞争力。推行标准作业成本法:(1)符合成本效益原则。(2)创建一个质量与效率并重的成本信息系统。(3)完善企业标准作业成本的定期检查 and 修正机制。

有学者研究管理会计的过去、现在、未来。在成本相关领域内的研究,虽然作用已经有所下降,但是在可靠性、适用性以及特殊问题上的研究还是能有所作为。在具体的计量和业绩评价上,可以考虑非会计衡量指标,扩大业绩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会计业绩。在披露问题上,不仅仅要考察财务风险和财务因素,而且还要更多体现公共需求。

有学者研究如何促进管理会计咨询服务市场发展。(1)规范会计市场监管。行政审批部门须编制会计服务审批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政审批事项应一律取消。(2)培育管理会计咨询服务市场。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同时发力,宏观方面,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微观方面,会计服务机构责无旁贷。(3)提升管理会计咨询服务层次。面对社会经济发展新环境,会计服务机构要在拓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的基础上,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以服务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和会计改革发展为动力,不断提升服务层次。(4)培养

管理会计咨询服务人才。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应突出实务导向,面向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促进会计人才市场健康发展来构建政府、单位、社会分工协同机制。

有学者研究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管理会计。从管理会计形成规律入手,认为中国特色管理会计应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在文化及其行为特征上体现管理会计的本土文化情境。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管理会计的创新与发展必须考虑国际化因素,即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尤其是工具和方法体系时,必须考虑市场导向。

(五)成本粘性。

有学者就市场竞争程度对成本粘性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处在不同竞争市场的上市企业成本粘性程度亦不同,且寡头市场的企业成本粘性程度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企业,上市企业的成本粘性行为受到其所在的竞争市场客观环境的影响;(2)成本粘性行为延迟了企业管理层面对市场变化所做出的经济决策,产生决策时滞,且成本粘性行为对其企业经济决策产生的延缓效应逐年降低;(3)相对于寡头市场,垄断竞争市场的企业管理层对市场变化更为敏感,成本粘性对其负面影响较小。

有学者就非经济动因是否可引致企业粘性成本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职工福利和企业捐赠支出越高的企业成本粘性程度越高,且该机制独立于经济动因;总体上更多考虑社会目标的国企比非国企成本粘性程度显著更高;企业中国有股比例与成本粘性程度显著正相关;考虑地区稳定等社会目标更多的地方国企成本粘性程度高于央企,但这两类国企成本粘性程度仍高于非国企。社会成本导致企业成本粘性的可能性,且该机制独立于经济动因的成本粘性形成机制。

有学者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成本粘性的关系。针对现有研究忽略了企业融资成本这一调整成本的缺陷,提出融资约束也会对企业的成本粘性产生影响。当考虑企业调整承诺资源所面临的的融资成本时,融资约束会通过直接影响企业在业务量上升时向上调整承诺资源的成本和间接影响在业务量下降时保留的多余资源来最终弱化企业的成本粘性。

(六)管理会计报告。

有学者研究内部报告在中国会计实践中的应用。(1)企业应充分认识内部报告对完善管理会计体系和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重要性,不断完善内部报告体系,提高内部报告内容的完整性,给予经营者决策相关信息,以保证其正确履行职责。(2)在信息技术极大发展的现代社会,我国企业应该利用先进的电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加强对内部报告电子化系统的设计与应用,以提高内部报告信息的传递效率,真正实现内部报告的价值。(3)中小企业应根据实际需求,有所偏重地编制内部报告。

有学者研究管理会计报告在央企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认为现有的管理会计报告在央企中存在的问题包括:重视生产经营报告,忽视企业管理会计报告;重视部门自身报告,忽视报告的横向及时传递;重视报告向上传递,忽视管理报告向下反馈;重视单个管理报告,忽视管理报告

协同效应；重视科技人员的发展，忽视管理会计队伍建设。针对以上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管理会计报告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提出以下对策：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健全管理会计组织和人员体系；确保管理报告质量，提升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地位；打破部门报告壁垒，保证各类管理报告传递畅通；强化问题整改落实，确保管理会计报告实行闭环；重视人才培养，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管理会计队伍。确保管理会计报告的质量是当前管理会计人员的首要任务。管理会计报告内容必须重点突出，目的必须明确，分析的问题必须深入，提出的管理建议必须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同时，跟踪解决管理会计报告发现的问题，指导企业改进相关管理工作，通过挖掘管理潜力，提高价值创造空间和水平。

有学者反思现行管理会计报告。管理会计报告、管理会计课程到底该讲什么以及对于管理会计研究的提示，以解释为什么管理会计和其他课程不同，为什么它是会计学的一个子学科以及为什么每个学生都需要去学管理会计。(1)应该加倍努力证明以上所说的是正确的。(2)很多研究都往往把管理者作为研究者考虑，但这会产生偏差，比如在模型设计时用错代理变量、错定模型以及错以为知道模型的本质等。所以，在具体研究中，就要避免这种身份假定，从多重角度去看问题。

(七)其他相关研究。

有学者研究非对称的成本习性。针对BLS(2014)对成本粘性的质疑，认为其结论是计量经济学的限制导致的。当解除这些限制后，结果表明成本粘性行为是存在的。因此，那些主张成本粘性不存在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以往的研究主要表明美国企业存在成本不对称性的行为，并没有表明其他国家的企业是否存在成本不对称性。实证发现非对称的成本习性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

有学者研究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1)注重企业战略定位，制定松弛有度的成本管理措施。(2)在优化业务流程的基础上建立以流程为中心的信息系统。(3)识别各价值活动的成本动因，强化企业成本控制。

有学者就董事会特征与企业成本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公司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成本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且在8~10人组成的董事会中代理成本最小。建议：(1)对于董事会规模和企业成本的关系来说，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控制在8、9人左右，不宜超过10人。(2)对于独立董事比例和企业成本的关系来说，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企业成本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机制实施的年数不够，独立董事机制的优越性还未充分发挥，因此尚未影响到企业的成本和管理效率，但独立董事机制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上市公司继续保留并完善独立董事的运行机制。(3)对于领导权结构和企业成本的关系来说，虽然总经理和董事长二职合一会增加企业利润，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但从长远角度和法律规范角度看，上市公司应将总经理和董事长二职分离。

有学者以欧洲财务报告独特环境为背景，研究跨国企

业以避税为目的的收入转移行为的动机与机会。基本结论是：(1)明确的证据表明，欧洲跨国公司会以税务为目的进行收入转移。收入通常会从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转移到低税率国家的母公司。(2)收入更容易从高税率、宽松税收执法的国家的子公司转移出来，这也符合了收入转移的成本决定税务动机的响应的观点。(3)非上市跨国企业会转移入或转移出子公司的国家，上市跨国企业很少因为税务原因进行转移，尤其是在低税率子公司的国家。综合证据表明，跨国企业会考虑变化的税务执法战略性来规划税收负担，相比非上市公司，高征税成本会抑制上市企业进行收入转移。

有学者通过实施了一系列实验来检验在不完全契约环境中，雇佣低工资的工人能否使企业的利润增加。研究发现：这些低工资并不能够提高企业的利润，因为聘请这些新的低工资工人的决定，直接导致了这些新的工人和企业中原有的工人和以前相比付出了更少的努力。此外，雇用那些低工资的工人同时也就降低了新工人的收益，进而降低了员工个人的社会福利。这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均表明企业在决定是否应该用新的低工资工人取代企业原有的一些工人时，应该同时考虑节省工资和潜在成本这两种因素。

有学者研究管制变化对成本习性的影响。考察了固定价格管制这一政策变化对医院成本弹性和成本不对称性的影响。固定价格管制无疑会导致企业成本压力和经营风险增加，因为企业收入与成本的相关性减弱。企业会以成本结构上的变化回应这一管制政策变化。一方面是增加成本弹性，即业务量每一百分比变化引起的成本变化百分比；另一方面是减少成本不对称性，即相对于业务量减少导致成本减少，业务量增加导致成本更大幅度增加。并且，与制度经济学理论一致，营利性医院(调整成本结构的弹性更大)政策反应强度大于非营利或公立医院。

六、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一)内部控制理论研究。

有学者研究发现：由于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并不连续，而这一问题能够通过内部控制来解决。随着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将逐渐变得正常化和制度化，从而企业能够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有学者研究内部控制制度变迁演化的动因选择。认为推动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与实现的动力有两种：一种是外力驱动型，即外部环境变迁演化所导致的对内部控制制度不满意，根据外部相关部门的要求而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及实现；另一种是内生驱动型，即由于本身变化而发生的对内部控制制度不满意，根据企业自身目标要求而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及实现。

有学者研究内部控制的“双刃剑”作用。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和不完全合约理论构建了内部控制影响企业运营的理论框架：内部控制通过改善信息传递和增强合约履行，减少既有代理成本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但由于降低了代理人的事后谈判能力，增加了其事前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以

预算活动为切入点,讨论内部控制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收入预算数据,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前述理论:内部控制好的企业,预算的执行效果更好;而内部控制不好的企业,更容易发生预算松弛,在外部环境较为确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与预算松弛之间的关系会被削弱。企业在进行内部控制建设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内部控制可能带来的收益,还要关注内部控制可能带来的成本,应当全面考量内部控制系统对企业运营的综合影响。特别是企业需要考虑内部控制对于运营活动的不同阶段的动态作用,防止管理层的行为趋于保守。事实上,怎样在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中,既防范运营风险,又激励管理层积极进取,始终是对企业管理创新的重挑战。

(二)内部控制效果研究。

有学者就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产权性质差异对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信号显示作用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向资本市场传递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运行有效和财务信息真实可靠的积极信号,这会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2)国有产权提供的隐性担保会弱化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信号显示功效。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国有上市公司,其债券融资成本降低的幅度较小。

有学者就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企业在决定高管薪酬时已经开始将内部控制这一基于风险控制的非财务因素考虑在内。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和高管薪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这说明国有企业在决定高管薪酬时更多地考虑了内部控制质量这一因素。

有学者就最终控制人性、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与勤勉程度、监事会监督力度、经理人激励程度等内部治理因素以及内部控制对债务契约治理效应发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效应遭到严重扭曲,债务融资不能很好地发挥激励约束作用;在内部治理的各因素中,最终控制人性、股权集中度、经理人激励程度对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有显著的影响,董事会独立性与勤勉程度、监事会监督力度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影响不显著;内部控制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学者基于公司存货管理,研究无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否会影响到一个公司的经营。研究发现:(1)与存货相关的材料管理存在缺陷的公司会系统地降低存货周转率,并且更可能报告存货减值,从而提供相对于公司来说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2)公司存货周转率的提高与修正存货跟踪管理缺陷有关,对存货跟踪缺陷的修正同样会增加销售、毛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3)对在内部控制上存在缺陷的存货的研究,具有普适性,并且提供了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与它们的现时管理和修正管理息息相关的证据。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否会降低股价崩盘的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与内部控制信息披

露水平显著负相关,随着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并且这一效应在信息透明度低以及业绩差的公司中更加显著;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此结论依然成立。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审计与盈余质量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实施内部控制审计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盈余质量,无论是聘请“大所”还是“小所”进行内部控制审计,上市公司均具有较高的盈余质量;相比于聘请小规模事务所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上市公司,聘请较大规模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其内部控制审计与盈余质量的关系更紧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程度更显著。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信贷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显著加剧了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内部控制缺陷越严重,企业遭受的信贷约束就越高,即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与所遭受的信贷约束显著正相关;企业对内部控制缺陷所采取的整改措施可以缓解其所引致的信贷约束,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内部控制缺陷给企业信贷融资带来的消极影响。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激进避税的公司中这一负相关关系更强;相比弱税收征管环境,在强税收征管环境下,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程度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更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尤其是激进的避税行为;而在强税收征管执法环境下,企业因避税而面临违规的风险更高,因此内部控制的约束效应显著更强。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公司诉讼对债务契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和公司被诉概率显著负相关;公司诉讼和债务成本显著正相关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的质量会影响到会计信息质量,进而影响到债务契约,内部控制质量和债务契约相关。

有学者就公司内部控制以及会计师事务所选择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与聘请高质量审计师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内部控制质量和高质量的审计师都能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且二者在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过程中存在替代关系;内部控制以及审计师的作用受到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与上市公司注册地是否在同一省区的影响。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审计意见、内部控制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来探究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动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比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其年报披露更加及时;(2)在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中,内部控制较好的公司其财务报表披露更加及时,从而验证了“好消息早、坏消息晚”这一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

有学者研究内部控制对投资者权利保护是否有效。认为内部控制不仅可以通过保障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间接为投资者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也可以通过保障查阅资料的完整性以及提供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保障投资者直接获

取企业信息；投资者决策权要想顺利实现直接取决于企业决策环境的支持以及投资者知情权的实现；内部控制还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以及提高经营效益直接作用于投资者收益权实现。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质量与信用违约互换利差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内部控制具有重大缺陷时，信用违约互换利差越高；（2）重大缺陷对于信用违约互换利差的影响主要受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驱动，而不是个别账户内部控制缺陷；（3）重大缺陷对于信用违约互换利差的影响，短期合约的作用比长期合约的作用要大。

有学者研究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的增加和减少问题。结论是：相比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内部控制薄弱公司的预防收益高于代理成本，持有流动资产可以给内部控制薄弱公司带来更大的帮助。因此，在治理内部控制缺陷的过程中，现金的价值会逐渐减少。如果收益超过成本，说明公司可以保证现金持有量；如果情况相反，企业则应采取相应措施治理内部控制。

有学者就内部薪酬差距的非对称性激励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间存在倒U关系，且正向激励效应随着差距的变化而有所差异；内部薪酬差距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激励企业绩效提高的作用，但是，这种激励由于公平性效应而不具有持续性，即超过临界值的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所激发的竞争效应下降，减缓了企业绩效增加的速度，不仅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薪酬差距的敏感性也大幅下降，这表明过大的薪酬差距弱化了对于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激励作用。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违规概率及频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违规概率及频率均显著负相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的确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守法水平；而且，该效应在法治水平低的地区更强，这意味着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外在制度的不足。内部控制五大要素中仅内部环境要素与公司违规概率及频率显著负相关。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缺陷是否会导致审计溢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具有审计溢价效应，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会增加这一效应，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则能够降低该效应；内部控制缺陷具有时滞性影响，前期内部控制缺陷对本期也具有审计溢价效应。

（三）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有学者研究政府内部控制制约机制。对十八届四中全会涉及的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简称三分一轮一流程）展开讨论，界定其内含，明确其原则与要求，以促进政府内部控制制约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并在政府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有学者研究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框架。旨在探索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以满足行政事业单位对自身监督与评价体系不断完善、提升管理水平、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强烈诉求。

有学者借鉴国外政府内部控制的先进经验，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探讨我国政府内部控制的几个问题：（1）我

国政府内部控制的概念，主要包括内部控制体系的划分和内部控制的概念界定；（2）我国政府内部控制的目标；（3）我国政府内部控制的边界，主要包括全面控制的发展的国际趋势和内部控制边界的建议；（4）我国政府内部控制的内容，以期对政府内部控制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为该领域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平台。通过分析得出结论：（1）我国内部控制体系划分的关键在于对非企业类组织的内部控制的划分；（2）将政府内部控制定义为：政府内部控制是一个由一国政府的监督机构、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实施的，旨在为实现政府各项行政管理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3）我国政府内部控制的目标也应当包括3类基本目标：运行目标、报告目标和遵循性目标；（4）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工作来看，我国政府内部控制起步较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先进的控制理念相去甚远，很多落马官员就是栽在经济问题上；（5）当前我国政府内部控制就是预算内部控制。

（四）风险管理研究。

有学者研究新三板企业内控缺陷。基于新三板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健全完善的迫切性，通过探究新三板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及措施，旨在为新三板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健全提供借鉴，进而为企业今后顺利转板上市奠定基础。

有学者研究税务申报的内部控制缺陷。发现税务方面的内部控制缺陷不太可能在发现时和财政年底之间矫正，而可能变得更严重，更可能导致财务错报；当管理层没有发现问题时，税务方面的内部控制缺陷的矫正错误变得更大，并且不良的控制设计、税收条款和监控活动更加明显；审计师对于严重程度的分类表明与税收条款、递延税款和操作失败有关的内部控制缺陷有更大的可能性导致错报。

有学者就管理层出具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虚假财务报告的发生率是否随着CPT所暗示的风险态度的变化而变化，虚假财务报告发生的概率在相关收益低或者相关损失高时较大，在相关收益高或者相关损失低时较小。

（五）其他相关研究。

有学者就内部审计是否能在内部控制方面发挥作用、内部审计能否改进内部控制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审计负责人专业能力显著改进内部控制质量，这表明内部审计负责人专业能力在完善和改进内部控制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研究没有发现内部审计规模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水平和改进产生显著影响。

有学者就萨班斯法案前后的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萨班斯法案对薪酬业绩敏感度有正向影响，可以推断出公司治理结构得到改善和代理成本得到降低。较高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意味着在管理方面付出较大的努力和股东、管理层之间的利益更好地连接到一起。

有学者研究家族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质量。发现根据萨班斯法案404条款，家族企业的内部控制相比于非家族企业具备更大的缺陷。家族企业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大多数是发生在具备双重股权性质的家族企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他类型的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存在更大的内部

控制缺陷。具有双重股权性质的家族企业相较于非家族企业呈现出更低水平的内部控制质量。

有学者基于2014年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分析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与年报审计意见差异。发现两者存在如下差异：(1)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出具持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意见，但并不一定导致年报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非标”；(2)无法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和是否对财务报告发表无法表示意见之间无因果关系；(3)若存在需要说明的事项，需对财务报告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但由于《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及《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对重大事项界定不明确，导致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滥用。

有学者研究缩短披露期限与萨班斯法案404条款对错报的联合影响发现：(1)在第一次缩短披露期限之后，快速申报公司的错报增加；(2)萨班斯法案404条款实施后，与非快速申报公司相比，快速申报公司的错报下降；(3)第二次披露期限的缩短主要针对大型快速申报公司，而大型快速申报公司与其他公司相比并未发现其错报增加。这就说明从长期来看，随着内部控制的加强，公司可以在规定期限内不以牺牲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为代价进行及时披露。

有学者研究家族企业财务报告中内部控制的质量发现：相比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存在更多内部控制方面的重大缺陷，家族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出现的频率与企业内部股权分置有关。

七、财务管理研究

(一) 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

有学者就股权资本成本与高管薪酬激励进行研究认为：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和资本投资项目既定的情况下，资本成本的降低意味着管理层工作质量的提高，这种提高以薪酬增加的方式予以了合理的补偿。伴随着资本成本的降低，企业的投资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财务竞争力得以提高。而在资本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管理层则应当将内部形成的现金分派给股东，弥补股东投资所承担的风险，同时避免造成过度投资。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上，资本成本的降低可以提升公司的股票价格，增加市场价值。因而，股票价格激励、股票期权激励与资本成本激励就成为性质完全一致、计量高度统一的高管薪酬制度。

有学者就投资者关系管理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标与权益资本成本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上市公司增加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2)信息不对称与权益资本成本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减少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可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3)提高公司可见度会提高权益资本成本，这与预期结果不一致；(4)吸引分析师跟随可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但是两者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5)从总体上看，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可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6)对于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显示了

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显著影响，与预期的结果相符。

有学者就企业规模、融资约束与资本结构波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规模对资本结构波动具有抑制作用，即规模越大的企业，资本结构波动越小；融资约束会驱动企业资本结构波动；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规模对资本结构波动的抑制作用会抵消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波动的助推作用。(2)在不同产权性质条件下，企业规模、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波动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业的规模和融资约束因素对资本结构波动的影响都小于民营企业，说明政府支持对资本结构波动具有抑制作用。

有学者就企业信用评级与资本结构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企业信用评级可能会升高，企业可能会减少债务发行以实现现实信用评级等级的调高；而对于有可能降级的企业，会采取减少负债融资或增加股权融资的决策，来防止降级的发生。国有控股公司和AAA级公司的信用评级对资本结构决策有显著影响。非国有控股公司在资本结构决策中不会考虑信用评级的升高与降级的可能；AAA级国有控股公司会充分利用其较高的信用评级，增加债务融资；只有AA-级公司考虑到降级可能导致其丧失发行债券的权力，有显著的减少负债融资或增发股权的融资行为；A+及以下等级的公司有显著的减少负债或增加股权的融资行为，来提高信用评级到政策要求的水平。信用评级升级之后的公司为了保持较高的信用评级没有显著的增发债务的融资行为，而降级的公司并没有采取合适的资本结构决策来使自己的信用评级“回升”；只有从AAA降级为AA+的公司有显著的减少负债融资的行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AAA级企业更加关注自身的信用评级；国有控股公司在信用评级升级后，会充分利用评级升高带来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的好处，而评级降级后的国有控股公司，有显著地减少债务的资本结构决策方案，国有控股公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信用评级对资本结构有更显著的影响。

有学者就真实盈余管理与权益资本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成长性差异是决定真实盈余管理的信号传递机制在中国资本市场能否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因素，高成长性上市公司实施真实盈余管理使得其权益资本成本下降，而低成长性上市公司实施真实盈余管理导致其权益资本成本上升。

有学者就异质股东的资本成本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1)以在权衡不同性质控股股东利益的基础上满足所有股东的报酬率要求作为公司治理的基本标准；(2)以资本成本为核心约束，实现多元股权的科学、理性混合；(3)逐步消除资本成本悖论异象。在国家控股居主体地位的背景下，非国家股东的加入势必带来资本成本更高的股权结构，从而产生“资本成本悖论”现象。这一现象将伴随国家股东职能的明晰、国有资本投资理性的提升以及中国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而逐渐消除，而这正是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趋于成功的过程。

有学者就企业研发投入与资本结构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研发投入形成的非债务税盾与有息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符合“替代效应”的假设预期；(2)企业越接

近“税收损耗状态”，研发投入增加越有可能降低企业借款的税率，进而减少企业有息债务水平，进一步验证非债务税盾视角解释的合理性；(3)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对税收更为敏感，在债务决策中更多地考虑税收因素的影响，“税收损耗状态”假说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4)根据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表明，上述结论主要适用于短期有息债务，而长期有息债务并未发现上述结论。

有学者就中国的信用评级是否影响发债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信用评级显著减低了债务成本，但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此结果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债券评级对发债成本的影响，不但经济效应明显减弱，而且统计显著性也完全消失。这表明，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的公信力，而评级膨胀也不会真正降低企业的发债成本。

有学者就股利税与资本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短)的企业，因为在改革之后其投资者的股利税会下降(上升)，这些企业债务融资的比重显著降低(提高)。股利税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在股利支付力度较大的企业更为显著。股利税对不同类别债务融资比重的影响存在差异。

有学者就大型投资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比无大型投资企业，有大型投资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在投资初期企业更多采用权益融资方式，而在投资后期更多采用负债融资方式；投资周期、负债水平和政治关联对投资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有显著影响；投资周期以及负债水平对投资末期的资本结构调整路径有显著影响，但政治关联对调整路径没有显著影响。

(二)投资管理。

有学者就债务分布与企业风险承担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均加大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子公司经营模式主导下，子公司银行债务比例上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整体的风险承担水平，该效果主要来自子公司银行债务契约对内部资本市场低效率投资的约束。债务分布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路径虽然包括抑制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但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前者更为明显，民营企业则是通过后一路径发挥影响。

有学者就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投机性投资与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有管理经历、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低年龄、男性的私营企业出资人，倾向于选择投机性投资战略。在显著性正向作用上，私营企业出资人拥有管理经历对净利润和销售额、中共党员身份对净利润和净资产、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净资产所表现的规律相同。在显著性负向作用上，中低学历和拥有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权的私营企业出资人对净利润和净资产、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中等学历的出资人对销售额所表现的规律相同。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与投机性投资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具有管理经历和中共党员身份对企业的净利润、净资产和销售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企业的净利润、净资产和销售额均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中低年龄、中低教育的对企业净利润和销售额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男性对企业净

利润和净资产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有学者就债权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我国债权治理效果整体呈现不确定性，不能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债权各构成部分的有效性不一致：商业信用的治理作用显著，但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的治理作用不明显；短期债权的治理作用显著，而长期债权不明显。紧缩货币政策下债权治理效果均得到增强。因此，可通过加速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和推动银行业改革、规范货币操作来提高我国债权治理有效性。

有学者就基金家族共同持股——意见分歧与股票收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基金家族共同持股投资组合及对冲投资组合取得显著超额收益，表明基金家族共同持股的股票相对非基金家族共同持股的股票具有更好的表现。无论是原始收益率还是CAPM模型调整后的收益率，基金家族共同持股显著提高了股票收益率。基金家族共同持股影响股票收益。基金家族共同持股能够显著降低股票换手率，表明基金家族降低了共持股票的意见分歧进而影响了股票价格。基金家族共同持股回报率上升并非是对基金家族共同持有股票的信息私有的反应。

有学者就CFO财务执行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CFO进入董事会，不仅有利于抑制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还有利于降低过度投资-债务期限错位之间的敏感性，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投资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这些表明，CFO进入董事会能够提高其财务执行力，有效发挥治理作用，进而提高公司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其它财务管理。

有学者就企业破产退出的财务利益冲突及其协调进行研究认为：破产退出既是一个时点概念，也是一个过程概念。由于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其利益相关者及其财务利益的诉求与冲突也有所不同。企业破产退出界定中的财务利益冲突，至少表现为冲突各方在财务利益冲突中的动态博弈、交叉冲突、破产管理人监督与参与下的利益冲突等特征；企业破产退出过程的财务利益冲突，至少表现为冲突各方的零和博弈、债权人内部的分层冲突、管理人与债权人的消长冲突等特征。企业破产退出的界定，是指对达到破产界限的企业是选择破产和解、破产重整还是破产清算的判定。应重点关注以下两方面问题：(1)强化信息沟通；(2)健全控制制度。企业破产退出过程是指企业被宣告破产清算至破产清算终结的清算过程，主要包括宣告破产、法院指定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申报债权、清理财产、估价变现财产、分配清算财产、终结破产程序等内容和步骤。提出3点建议：健全信息沟通网络；建立清算治理结构；优化内部控制制度。

有学者就环境不确定性、财务柔性与企业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即企业可以通过在前期储备财务柔性来提高企业价值；考虑企业面对的环境不确定性，当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财务柔性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越大；针对不同

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的分组研究结果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更大,其储备的财务柔性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也越大。

有学者就业绩型股票期权的管理层收益与激励效果实证研究发现:(1)由于行权时的公司股价不高于期权的行权价格,相当一部分管理层虽然完成了行权条件的业绩指标要求,却没有从股票期权计划中获得收益或者得到的收益十分有限;(2)管理层预期股票期权的收益越低,管理层就越不愿意努力工作、完成既定业绩指标以获得行权资格,股票期权的短期激励效果也就越差;(3)如果管理层获得的期权收益较低,考核期之后的公司业绩也无法得到提升。

有学者就企业创新与高管薪酬进行实证研究:国外研究表明,在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上述关系有所减弱或者不存在。这些研究可能意味着,与国有非高新技术公司相比,在国有高新技术公司中,公司创新和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有所增强。对于中央企业高管的激励可能更多地来自未来政治上的升迁,而不仅仅限于货币薪酬,由此会弱化中央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从而可能进一步弱化对中央企业高管创新活动的货币薪酬激励;另一方面,中央企业关系着我国国计民生,具有天然的垄断性质,面临较少的市场竞争。而对于地方国有企业而言,这些企业是在政府不断放权让利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面临更少的政府干预和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在地方国有企业中,对高管创新活动的货币薪酬激励就显得更为重要。在创新越多的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有所减弱,但是,这一关系只存在于国有高新技术公司中,在国有非高新技术公司这一关系不存在;与中央控股高新技术公司相比,在地方国有高新技术公司中,公司创新和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有所增强。

有学者就制度环境、关系交易与现金持有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企业关系交易的增加,供应商会出于战略承诺和风险防御动机持有更多的现金,其中市场地位较低的非国有企业该动机更加强烈。地区间制度环境差异对非国有企业影响较大,政府不必要干预较少、金融服务较发达以及社会诚信度较高的地区,非国有企业该动机明显较低,而地区制度环境差异对国有企业该动机的影响较不明显。建议:(1)微观上,企业应当从优化企业战略、促进产品创新、提高产品质量等多方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并适时兼顾供销风险及供应链整合以谋求可持续发展;(2)宏观上,应积极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缩小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别待遇,改善落后地区的制度环境,为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提供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环境,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

有学者就女性CEO、社会信任和公司融资约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性别歧视和女性自身性格特点的作用下,女性担任CEO的公司负债融资水平较低,面临着更严重的融资约束;在高社会信任地区,女性CEO所增加的融资约束程度显著高于低社会信任地区。基于上述发现,为给女性

担任CEO的公司更大的发展空间,应减少性别歧视,降低女性任CEO的公司信贷难度并增加信贷规模,尤其是在社会信任程度高的地区。女性自身也应避免过度谨慎、保守和规避风险,适当举债以降低公司的融资约束。投资者应对女性担任CEO的公司加以关注,尽量避免由于融资约束问题而带来的投资损失。

有学者就企业规模、动态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规模与研发竞争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企业规模与营销竞争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更加倾向实施研发竞争行为而减少实施营销竞争行为。(2)资本结构在企业规模与动态竞争行为选择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即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企业规模对研发竞争行为的正向影响会逐渐削弱,对营销竞争行为的负向影响会逐渐强化。(3)企业动态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与营销竞争行为相比,研发竞争行为对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

有学者就CEO、董事长接受央视采访会影响股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投资者会因为关注而产生注意力驱动交易行为,在事件日产生了显著为正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并在其后反转为负收益,异常交易量出现显著变化并且与超额收益趋势大致相同。(2)采访持续时间对投资者关注行为有显著影响,采访持续时间越长,事件日超额收益越大,之后的反转也更为严重;在19:00~23:00时段播放的节目对投资者关注行为的影响比其他时间段更大;采访节目会因为事件日顺延天数的增加而对投资者关注行为的影响逐渐削弱;而被采访人职位、年龄和任职年限对投资者关注行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客户集中度的财务效应与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客户集中度与销售毛利率、资产净利率显著负相关。随着客户集中度的提高,销售毛利率、资产净利率会下降;(2)客户集中度与经营杠杆系数显著负相关。随着客户集中度的提高,经营风险会下降;(3)客户集中度与市销率、市盈率显著正相关,资本市场对客户集中度的反应是积极的、正面的。

有学者就中小板上市公司增长与盈利能力动态相互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企业增长与盈利能力相互作用研究中,选AR(1)自回归模型是不科学的。(2)当期的权益和总资产增加,会引起企业增长和盈利能力的增加,有助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但前一期的资产规模和当期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不利于盈利能力的提高。这与企业盈利能力过于依赖于投资的众多研究结论相一致。(3)企业前期的增长不利于本期的增长,同时前期盈利能力不一定影响企业增长,如果权益和总资产是提高企业增长和盈利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该问题有待于从投资效率和营运资本效率角度思考。

有学者就IPO股权激励与高管团队稳定性进行案例分析:认为IPO前的高管股权激励安排对拟上市的民企而言是吸引和稳定高素质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在上市后巨大的财富效应必然引发高管套现的动机,而辞职作为一种套现的方式,既可以规避掉相关政策的约束,也可以尽快变现,避免受到新股“变脸”的影响。为套现而进行高管辞职,对于

公司而言无疑会使投资者对公司的前景产生怀疑并动摇投资信心,人才的流失也会对公司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建议:(1)对公司IPO前股权激励采取间接持股模式;(2)必要时采用司法手段,对高管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有学者就EVA在我国国有企业业绩评价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并且建议:(1)进行员工培训,普及EVA理论;(2)整合财务系统,提供决策支持;(3)将EVA与现行管理工具结合,共创企业价值;(4)灵活设计针对员工和企业的EVA业绩考核体系;(5)改革激励机制,保证EVA考核体系有效推进。由于信贷政策、折旧政策及薪酬体系的影响使得EVA本身存在缺陷;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尚不完善使得实施EVA的外部环境尚不完全具备;同时公司管理层认识不够、经验不足。建议:(1)将企业传统的“年度标准值”转变为“行业标准值”并及时调整,以完善EVA指标本身存在的局限性;(2)优化外部环境,完善市场约束机制;(3)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有学者就国有企业工资高低标准进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工资并没有过高。从行业平均工资来看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低于其他单位;从行业工资不平等角度来看其他单位的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国有单位;从具体行业来看国有单位工资略高的行业都是关系到公共服务、社会民生的行业,而且其工资水平也只是相当于平均水平。国企和私企的工资不但不高反而都偏低了,只是国企的情况好于私企。认为:(1)在我国工资水平整体偏低的情况下,不能将市场决定的私企工资水平作为标准,借以批评国企工资过高;(2)国有单位的工资过高不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相反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到了缩小差距的作用;(3)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市场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必然低于劳动力价值,所以私企工资较低,在私企内资本侵蚀劳动力报酬的现象较明显,而国企要好很多。因此,在推进国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应该继续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发挥国企的带头作用,拉动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

有学者从财务预警体系的框架构建和应用建议两方面入手,探讨财务预警体系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随着企业经营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管理人员预警意识的不断增强,财务预警管理在企业内的推广范围不断扩大。但总体来说,企业财务预警管理的实践活动仍停留在建立财务预警系统这一层次,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并未形成一套真正意义上的财务预警体系。建议企业应培养风险意识、形成预警文化,创新信息系统、整合预警资源,因地制宜设计财务指标、建立预警机构,健全运行机制,从而全面提高财务预警系统效率。

有学者就集团企业预算管理的演进与意义构建进行案例研究发现:神华集团实施预算管理先后经历了预算管理植入、预算管理与管理控制系统融合、预算管理向业务纵深层次扎根和预算管理成为企业战略支持工具等4个发展阶段,各阶段意义构建模式分别是:最小程度的意义构建、受限的意义构建、分散的意义构建和导向明确的意义构建。认为:意义构建活动使企业和个人能够阐释预算管理情景,建立对预算管理的集体认知,并以此为指导,调整预算实施

行为,进而影响企业预算管理的实施效果和管理功能的发挥,据此提出集体企业预算管理实施的意义构建演进模型。

八、公司理财研究

(一)公司融资。

有学者就产业政策、银行关联与企业债务融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是影响企业建立银行关联的重要因素,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建立银行关联。总体而言,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增加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体现出银行关联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与银行关联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银行关联能够帮助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提高债务融资管理效率,优化债务融资决策,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有学者就县域小微企业融资现状与对策进行研究。在融资方式上,县域小微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是民间融资与在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贷款,即采取非正规金融途径融资。在融资成本上,对小微企业来说,正规金融融资比非正规金融融资的成本高。这可能与小微企业向银行贷款时附带很多额外要求有关。所以大部分的县域小微企业在创业初期通常采取民间资本借贷方式进行融资。在资金利用率上,小微企业使用资金时很少衡量收益与成本的关系,当企业资金面临短缺或不足时,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快速获得生产所需的资金,而没有考虑所获贷款资金的预计收益率是否大于贷款利率,有时会盲目贷款,甚至出现贷款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在清偿能力上,大多数的小微企业信誉问题还有待提高。县域小微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是融资方式和渠道存在较大局限性,融资风险大且风险评价难,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建议:(1)发展网络融资、产业链金融等融资方式;(2)创新县域小微企业融资途径如,发展风险投资、推广融资租赁、建立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3)推进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有学者就公司如何获得银行授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财务特征上,公司规模和净营运资本占比与公司能否获得银行授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的公司相对越容易获得银行的青睐。由于我国公司的特殊性,盈利能力对公司能否获得银行授信之间存在负向相关但不显著。行业现金流波动性的系数都为负值且非常显著,说明流动性风险越低的公司越容易获得银行授信。(2)治理特征上,公司治理的好坏对公司能否获得银行授信有一定的影响。股权特征中,股权集中度并非越低越好,管理层持股比例也并非越高越好,二者与公司能否获得银行授信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董事会特征中,独立董事比例系数越高意味着公司治理相对越好,越容易获得银行授信。公司的投资评级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评判标准,与公司能否获得银行授信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建议:(1)改善公司的流动性管理,综合考虑自身的财务特征和治理特征来确定公司的流动性额度;(2)加强授信银行业务拓展和风险把控的协调,通过现场检查、外部资信收集、公司财务能力分析和公司治理状况分析,结合客户的运作模型和资金的使用

方式,测算出客户能够偿还的授信额度,提高授信额度的使用效率;(3)强化内外部公司治理监督,通过设定有效的监督机制来约束管理者行为,对管理者在流动性资源上的自利行为进行严厉把关,争取公司的流动性资源为公司价值的最大化服务。

有学者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由中小银行发展所推动的银行业结构变化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而银行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比例构成以及金融发展水平都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形成稳健的联系。在银行业结构与实体经济不相适应的情况下,由金融总量扩张所推动的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十分有限,因此,中国金融改革应紧紧围绕银行业结构调整来推进金融结构优化进程,其中银行业结构调整的要旨在于为中小银行发展创造有利空间。

(二)公司并购。

有学者就现金持有、并购决策与并购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相对于现金持有不足的公司,现金持有超额的公司更有可能发动并购,而且高管持股比例小于或等于25%的现金持有超额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发动并购,说明现金持有超额的公司更可能存在代理问题;(2)主并公司的现金持有状况与短期并购绩效不存在显著关系,说明受投资者认知能力所限,短期内市场未就主并公司现金持有状况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做出及时的有效反应;(3)现金持有超额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与长期并购绩效负相关,而现金持有不足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与长期并购绩效不存在显著关系。

有学者就中国企业境外并购财务安排现状、问题及改进建议进行研究。在当前境外并购中,目标企业股价不准引起的并购出价抬高、融资支付方式选择不当和财务整合失败等造成的财务风险常常出现。在估值环节,市盈率法等是确定对价的主流方式。对目标企业进行价值评估是境外并购的核心环节。在融资环节,尽管中国境外并购的主要融资渠道还是来源于自有资金、国内银行贷款以及国际银团贷款等负债融资,但巨额的资金需求促使部分企业开始尝试海外上市、海外发债、换股等多元化融资手段。在支付环节,由于国内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多元支付方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企业在境外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上也有一定局限性,现金支付仍是主流支付方式。在尽职调查环节,不足4成企业利用尽职调查摸底目标企业,尽职调查的缺失也是中国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之一。融资渠道单一、资本项下管制以及境内外资本市场隔离、部分金融政策、部分资本市场规定、企业会计核算不规范以及信息披露不完善都制约中国企业境外并购。要想提高企业境外并购财务安排能力,要加强金融机构对企业境外并购的支持,要放宽对境外并购企业在证券期货市场上的部分限制,要积极创新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范围和模式,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目标企业向并购方提供财务支持,打通境外并购项下境内外资本市场分离的情形,进一步发挥投资银行、资信评估等中介机构的作用,推动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的国际化,进一步发挥各类境外组织的作用。

有学者就中央企业跨国并购定价的特征、问题及对策进行研究。认为:(1)并购价格以企业价值为基础,中央企

业及中介机构估值水平有待提升。当前我国中央企业一般以专业中介机构的估值建议作为价值决策的基础,但是中央企业及有关中介机构在并购对象好坏、风险控制和价值评估等方面的能力有待提升;(2)并购价格具有动态性和策略性,中央企业灵活应用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并购定价一般在初始阶段明确“交易底价”,在谈判过程中确定谈判价格,通过谈判确定最终投资并购价格。中央企业跨国并购中,有关中介机构介入较晚,中央企业报价及谈判不够灵活;(3)并购价格是双方博弈、谈判的结果,中央企业博弈、谈判能力有待提升;(4)并购交易价格以市场价值为基础,而非国际通用的投资价值,这样会限制并购的开展。目前国内投资并购评估以市场价值为主,较少考虑企业投资并购中的协同效应;(5)并购价格具有定向性和特定性,中央企业尽职调查及并购目标分析做得不够;(6)重要跨国并购尤其是中央企业跨国并购的定价易受到政府管制及政策法规因素影响和制约。重要投资并购、跨国投资并购项目涉及利益复杂、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定价是政府审批的重要因素;(7)并购价格受对价支付方式的制约,中央企业现金支付多,灵活应用组合方式少。建议:(1)要积极培养熟悉国际规则和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推动相关专业中介机构的发展;(2)要积极开发投资价值类型的研究及应用;(3)要以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为契机,组合各种形式的资本,发挥各种专长,避免单纯国企属性可能受到的制约,从而带动各方实现共赢。

有学者就海外横向并购能否提升公司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海外横向并购对制造业样本公司绩效的各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影响,海外横向并购导致公司的市场收益能力出现了持续的、大幅度的下降,而对公司的盈利能力、资产流动性和盈余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则相对较小。(2)海外横向并购给制造业公司带来绩效下降的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在并购后的第1、2年比较显著,而在其他年份并不显著。

有学者就信息优势对企业并购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社会网络中信息优势会降低并购过程中的事前不确定性和事后不确定性,因而对企业的并购发起行为及并购绩效产生正面影响。(2)社会网络中的信息优势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内在影响机理可表述为“信息优势—信息资源—并购决策”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其中,“信息优势—信息资源”的转化过程取决于管理者的“求知欲”,是管理者对搜集信息的成本收益的权衡。(3)“信息优势—信息资源”的转化过程还会受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其权衡搜集信息的成本收益后的理性选择。

有学者就高管团队的社会资本能否改变企业并购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高管团队嵌入在金融网络的社会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具有促进作用;(2)高管团队嵌入在校友网络的社会资本不利于企业并购后的绩效;(3)高管团队嵌入在政治网络的社会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有两方面的影响:高管团队政府工作网络的社会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而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网络的社会资本并不利

于企业并购后的绩效；(4)区域因素对企业高管团队嵌入在校友网络的社会资本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但对其嵌入在金融网络的社会资本与并购绩效间的关系有负向的调节作用。

(三)公司绩效管理。

有学者就股权分置改革是否提高公司资产重组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无论从短窗口还是中长窗口来看，股改后重大资产重组的绩效显著优于股改前，股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代理问题，使得大股东在做出重大资产重组决策时更多出于提升公司价值的动机，产生明显的公司治理效应。股改对重组财富效应的影响与重组的规模有关，一般大规模的重组在股改后的绩效有显著提升，而特大规模的重组在股改前后绩效无差异。

有学者就高层管理团队薪酬差异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员工具有较高的权利距离，不同级别员工之间的纵向薪酬差异所带来的公平感缺失相对较弱，因此，员工能容忍和接受较大的纵向薪酬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处在一个集体主义文化中，高管团队成员更加不能容忍同级别员工之间很大的薪酬差异。高管团队的纵向薪酬差异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提高，而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异对组织绩效并不产生实质影响。市场环境不确定性更多地作用于纵向薪酬差异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更多地作用于水平薪酬差异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就“泛多角化”经营是否能够提高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相关多角化和高度多角化相比，“泛多角化”经营并不能有效提高企业当前绩效水平。“泛多角化”是一种财务导向性的多角化经营战略，其主要优势在于分散风险，不宜成为旅游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认为国内旅游上市公司应当着力寻找和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相关程度较高的产品和服务，将相关多角化作为企业未来成长和发展的主要方向，以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但值得注意的是从长期来看，无论是相关多角化还是“泛多角化”都不足以对企业未来绩效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在确定产品和服务的前提下，国内旅游企业必须修炼内功、培育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实现基业长青。

有学者就企业迎合行为与政府补贴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盈利状况相对较差的企业，倾向于采取负向盈余操纵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而盈利状况相对较好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寻租的方式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2)盈利状况较差的企业采取负向盈余操纵所获得的政府补贴，反而弱化了政府补贴的企业绩效和社会绩效。(3)盈利状况相对较好的企业，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的政府补贴虽然强化了政府补贴的社会绩效，但是同样弱化了政府补贴的企业绩效。

有学者就社会责任视角下国有企业分红对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企分红与财务绩效和包含了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综合绩效均显著负相关，存在低分红企业具有高绩效的现象，反映出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是可以协同的；随着行业垄断程度的加深，分红比例的提高有

利于国企绩效的提升，即伴随着行业垄断的加深、企业规模增大，抵御风险能力相应增强，此时分红比例的提高有利于国企绩效的提升。针对我国国企分红政策与国企绩效的提高，建议：应提高垄断型国企的红利上缴比例，确立更加科学的分红模式；进一步完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模式，加大对国企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关注力度。

有学者就神华集团绩效考核体系创建及优化提出建议：

(1)优化考核体系，其中包括革新EVA考核模式，梳理神华集团多板块的价值链，补充完善指标库，设计整体利润与协同效率的考核指标，完善业绩考核系数的计算；(2)重构评估体系，结合“创一流”的目标，针对企业的价值创造、精益运营、持续发展三大能力进行评价，并采用科学的计分方法使结果更加客观公正；(3)提升监控能力，针对关键考核指标建立预警机制，实时监控绩效数据，定期分析诊断；(4)修订考评管理办法，完善绩效考评管理制度体系；(5)开发与完善信息系统，引入SAP BI平台，其功能模块能够最大化地满足子公司企业管理部门的工作需求。

有学者就高管年龄与薪酬激励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年龄对薪酬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年龄与绝对年龄越大的高管获得了越高水平的薪酬，但同时发现与薪酬存在显著关系的年龄与企业业绩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并且高管的年龄降低了薪酬业绩的敏感性。年龄越大的高管可能更具有政治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增强了其在薪酬契约签订中的谈判力和控制力。

有学者就创业板公司负财务费用现象对营业利润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创业板公司普遍存在资金充裕的现象，那么对于创业板负财务费用现象的分析就应该从资金入手，而对于创业板来说资金的一大来源就是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创业板公司的负财务费用现象普遍存在，且影响营业利润的核算结果，从而影响了财务指标的衡量质量。可见传统的营业利润损益模式面临巨额负财务费用会对利润产生扭曲的弊端。因此对核心利润重新界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剔除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营业利润的个性项目——负财务费用，使营业利润更为准确地反映企业经营活动带来的业绩。

有学者就重大资产重组中是否存在基金内幕交易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存在严重的基金内幕交易，而且重大资产重组主要着眼于改善公司业绩，理顺股权结构，优化治理结构，所以基金基于价值改变在重组当期更倾向于买入。基金更倾向于买入还是做空主要由重组性质所决定，第二、三季度相比于另外两季更有可能发生基金内幕交易，资本密集型的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更容易发生内幕泄密。

(四)公司利润分配。

有学者就现金股利迎合与股权融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半强制分红政策具有两面性。采取现金股利迎合提高了股权融资的资金配置效率，但降低了股权资金的交易效率。刻意迎合现金股利的公司既不能提高股权资金交易效率，也不能提高股权资金的配置效率。建议：应促进公司形成明确的分红政策，增强现金分红的持续性，提高上市公司分红决策的透明度，以稳定投资者预期；证监会等相关

部门应该严格把关,通过上市公司最近3年分红情况筛选出盈利能力尚佳的公司进行再融资,帮助投资者筛选出优质的公司,建立异常派现公司警示制度。

有学者就公允价值会计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现金股利支配水平较低,上市公司分配意愿普遍较低。(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且反应系数同经常性损益与现金股利的反应系数几乎一样。说明管理者对两类不同性质的收益赋予相同的权重,这与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企业的长远利益相违背。(3)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不相关,而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二者显著相关。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部分政策目标,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更愿意不分配、少分配,以享受更多的在职消费。(4)股权集中度低的企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不相关,而在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二者显著正相关。

有学者就现金股利的异常派现、代理成本与公司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正常派现是一种理性派现行为,而非正常派现则是非理性派现行为。(2)控制结构会影响异常高派现公司的代理成本,直接控制结构有助于抑制异常高派现所产生的代理成本;控制结构也会影响异常低派现公司的代理效率,直接控制公司的异常低派现会降低公司的代理效率。(3)股权性质不会通过派现行为对公司代理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仅私有性质通过异常低派现降低公司的代理效率。建议:(1)限制异常高派现行为。异常高派现是一种非理性派现行为,应该进行限制,监管部门应该制定相关条款,限制公司超越自身能力的异常高派现行为。(2)监管异常低派现行为。对于异常低派现要加强监管,对于不进行派现而又没有适当理由的公司应进行重点关注。(3)鼓励理性派现行为。正常派现会增加代理效率和公司价值,是一种兼顾投资者回报和发展能力的派现行为,是上市公司规范化利润分配的必要途径。

(五)公司投资。

有学者就旅游上市公司多元化投资与企业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旅游上市公司多元化投资程度与企业风险正相关,经理人堑壕防御会显著强化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经理人堑壕防御水平越高,实施多元化投资越容易加剧企业风险。这说明,多元化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其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多元化投资行为的实施不仅未能有效分散风险,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旅游企业收益率的波动。当前旅游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依然严重,经理人存在明显的堑壕防御行为。经理人堑壕防御会显著强化多元化程度与旅游企业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经理人堑壕防御水平越高,实施多元化投资越容易加剧企业风险。

有学者就CEO继任、业绩偏离度和公司研发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CEO继任与公司研发投入负相关,这意味着新任CEO上任后为追求“速胜”以消除离任威胁倾向于降低公司资源组合中见效慢、不确定性高的资源投入;(2)公司行业业绩偏离度增强了CEO继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负

效应,因为行业业绩偏离度提高了董事会监督新任CEO的强度,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新任CEO追求“速胜”的动机;(3)公司历史业绩偏离度减弱了CEO继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负效应,因为历史业绩偏离度使董事会将现有不良业绩更多归因于前任CEO的低效,从而降低了对新任CEO的监督强度和期望,从而降低新任CEO的离任威胁和追求“速胜”的动机。

有学者就风险投资特征、风险投资IPO退出与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上市后,我国风险投资呈现出一次性完全退出较少,非连续性完全退出较多的特征。风险投资特征对于其退出企业具有重要影响。风险投资所持有公司的股份越少,企业上市后其退出的概率越大;风险投资联合持股会导致企业上市后其更加易于退出。风险投资退出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企业业绩会在风险投资退出后明显下滑;风险投资退出企业时减持原有股份越多,则企业绩效会变得越差。这从侧面佐证了风险投资对于提高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

九、审计研究

(一)审计方法与技术。

有学者通过实验证明:一个深思熟虑的思维方式能够提高审计师识别不合理估计的能力,通过识别和合并来自不同方面相互矛盾的信息进行分析审计和提高批判性地思考证据的能力;通过使其拥有不同的看法而不是仅仅努力地工作,可以提高识别不合理估计的能力,为解决审计质量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

有学者提出基于迭代式聚类的审计疑点发现方法。该方法可在无先验知识的情形下,通过对审计指标的分析,将与大多数被审计对象行为明显相异的少数对象自主识别为审计疑点。研究表明:迭代式聚类所发现的利润增长率可疑的公司中,不少受到了上海交易所、证监会等的整改通知甚至是行政处罚。但挖掘出来的可疑公司不一定都存在问题,需要审计人员对这些可疑公司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排查,才能确定为审计疑点。

有学者探讨了注册会计师职业怀疑缺失的问题,分析并提出建议:从监管者来讲,在完善审计质量监控制度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的时时监控,针对风险提示领域加强检查频率;从会计师事务所来讲,包括以下3个方面:(1)引导和强化注册会计师对职业怀疑实质的理解;(2)在事务所层面及项目组层面强调注册会计师保持职业怀疑;(3)用制度保障注册会计师实质地执行审计程序并合理地记录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有学者研究了会计准则的精确度、审计技术专长和审计框架对审计事务所诉讼风险的影响。证据表明:在不精确的和精确的会计准则两种情况下,相比一般专家,技术专家的利用更能降低陪审员评估疏忽;在不精确的会计准则下,利用审计框架(相对于没有使用框架)抑制陪审员评估疏忽时,一般专家比技术专家更有优势。

有学者考察了审计师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认知。研究表明:审计师能够识别真实盈余管理,并将真实盈余管理作

为风险因素在审计定价决策中加以考虑；会计师事务所对真实盈余管理带来的风险现阶段整体可控，事务所倾向于采取客户保留决策；事务所主要通过审计师付出额外的努力和更换审计团队两种策略来降低审计风险。

(二) 审计师变更与审计合谋。

有学者以实务界的经验为基础，研究了审计工作独立性的实质。有证据表明，审计业务的顺利执行取决于被审计单位配合审计师工作的意愿。为了使被审计单位更加配合，审计团队成员采取一系列的“关系策略”，以保证自身勤勉高效工作的能力。但同时，这也降低了他们在必要时采取强硬措施的可能性。因此，审计是能力和意愿的复杂权衡。最后，已有证据表明正式制度不能实现工作独立性，因此审计师独立性的实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在实践中是一个不断的协商与再协商的过程。

有学者研究了大股东博弈、审计意见变更与审计风险相关问题。研究发现，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博弈不但影响上市公司利润操纵和盈余管理等公司治理行为，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注册会计师评估审计风险和变更审计意见。

有学者将财务报表重述的传染效应研究细化到审计师个人的维度，考察了聘请相同的审计师是否会导致公司间低质量财务信息的传染。实证结果表明：当公司与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公司存在审计师联结时，公司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概率显著更高，并且这一关系主要是由项目审计师联结而非复核合伙人联结带来的。

有学者从流入资产的行业变更、综合性资产流动方式、重组目标的国有产权性质以及实际控制人变化等重组行为特征与审计师变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对于全样本来说，当上市公司发生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时，更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对于重组样本来说，重组公司的跨行业流入资产、混合型资产流动方式、国有性质的重组目标和实际控制人变化都会提高审计师变更概率。

(三) 审计质量研究。

有学者就惩戒风险、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惩戒风险压力与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正相关，在法制环境更为健全，即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更高的地区，事务所审计质量更高；但是，惩戒风险对于大规模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强化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是我国法律的威慑力以及执行力度还不够造成的。

有学者就产品市场竞争、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产品市场竞争对于“事务所规模——审计质量”之间正相关的强化效应并未体现出来。

有学者对2015年1月IAASB正式发布的审计报告准则《审计准则第701号——在独立审计报告中沟通重要审计事项》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审计报告的改进降低了投资者感知的审计人员责任，而且当披露的事项与重大错报事项一致的时候，更能降低投资者感知的审计人员责任。

有学者就公共压力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

现：媒体监督与审计质量正相关，法律监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不显著，政府监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会计事务所规模在政府监管影响审计质量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中强于有限责任制，在没有内部培训资质的会计事务所中强于现有内部培训资质的会计事务所。

有学者就事务所对客户经济依赖是否削弱了审计独立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经济依赖对象是客户的事务所相比，经济依赖对象是美国事务所的审计主体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显著较高、可操控应计项的绝对值显著较低；同时，客户重要性越高，对客户没有经济依赖的事务所比对客户有经济依赖的事务所有显著更高的审计质量。

有学者就低价竞争行为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折扣收费现象与客户为达到分析师预测而操纵利润的行为有关，这种现象在萨班斯法案通过前几年最为明显，在萨班斯法案颁布之后就消失了，而在研究期间的后5年又再一次出现。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对注册会计师发表审计意见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在判断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影响时，主要有3种处理方式：(1)认为无法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而发表保留意见；(2)认为监管行动的未来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而发表强调事项说明段；(3)认为立案调查不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产生影响。相对于被立案调查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影响，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时，同样存在较大的分歧。

(四) 审计收费研究。

有学者就管理者能力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对审计收费有着经济 and 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公司管理者能力越强，其支付的审计费用越低。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低以及企业风险低的上市公司中。

有学者就未决诉讼对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不存在未决诉讼的企业，事务所对存在未决诉讼的企业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当未决诉讼涉及的金额较高时，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更高，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未决诉讼中被告与原告的审计费用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都显著高于不存在未决诉讼的企业。

有学者考察了高管审计背景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和审计定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具有审计背景的公司为了实现较低风险水平下的私有收益最大化，有从应计盈余管理转向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倾向，事务所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增加额外的审计收费以弥补过高的审计风险，而“校友效应”却使事务所显著减少该类公司的审计收费。这表明，高管审计背景可能会导致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下降、审计风险上升。

企业的避税行为，将会增加审计风险、提高审计师的努力水平，这是否会导致审计定价的提高呢？有学者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避税越严重，审计收费越高；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避税动机更加严重，且审计收费更高；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对于存在避税动机的民营企业，

审计定价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企业。

有学者就会计-税收差异能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税差异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审计师在审计的过程中，应当考虑会税差异带来的审计风险，尤其是在评估企业的盈余管理风险的过程中，更要关注会税差异，进而降低审计风险。

有学者就分析师预测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准确度与审计收费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预测离散度与审计收费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虽然已有众多文献研究了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但是很少研究股权激励对审计师风险评估和价格决策的影响。有学者通过调查首席执行官股权激励和审计师收费二者间的关系来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理人财富对股票回报波动率敏感度和审计师收费间存在正向关系，但并未找到证据表明经理人财富对股票价格敏感度和审计收费间的关系。

有学者就特定行业的专业化审计师的定价决策是否会受到行业同质化程度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虽然行业专业化的审计师在非同质化的行业中审计收费更高，但是行业专业化的审计师在同质化运作尤其既是同质化运作又有特殊会计处理需求的行业，审计收费会更低，但这种现象只有在审计客户议价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才成立；在存在规模经济（通过更低的审计收费来显示）的行业中，专业化的审计师的审计质量并没有下降。

（五）审计意见的经济影响。

有学者研究了审计质量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发现：在我国企业中确实存在着费用粘性，且高质量外部审计可以降低企业的费用粘性。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费用粘性更加严重，且高质量审计在降低国有企业费用粘性方面的作用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

有学者就审计意见的决策有用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通过向股东传递有关盈余质量的信号，审计意见提高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间接地发挥了公司治理的作用，特别在信息不对称较为严重的国有企业更是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有学者从审计师选择（即不同的审计师规模和是否具有审计行业专长）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视角，对审计师的信号传递功能与信息保险功能是否存在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际四大能够发挥信号传递功能与信息保险功能；行业专长只能发挥信息功能；国内“十大”相对于国内非“十大”，审计师仅在信息和保险功能上存在差异，并且显著降低了权益资本成本，在信号传递功能上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

有学者就资本市场审计客户是否会对事务所的审计失败实施惩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声誉受损确实显著降低了事务所的市场份额，无论是审计客户的数量还是审计收费金额都发生了显著的下降。

有学者研究了审计师法律责任风险关注度与真实盈余

管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师增强法律责任风险关注度能够降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高审计质量。审计师增强法律责任风险关注度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对于审计监管，可以增加审计收费溢价以及完善审计师个人法律环境；对于审计师，可以降低自身的法律责任风险。

（六）会计师事务所管理与业务拓展。

有学者对审计市场的监管和管制进行辨析，指出，管制是指政府机构根据法律法规，通过行政力量实现资源配置职能，最常用的手段包括：发牌照、行政审批、限制经营范围等；监管是指政府制定游戏规则，并通过游戏规则遵守情况的监督及对违法者的处罚确保游戏规则得到遵守。认为，加大监管对于提高审计市场效率至关重要，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审计市场的监管，放松管制，更多地发挥市场功能。

有学者探讨了中美跨境审计监管僵局及可能的合作模式。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大多选择由注册在中国境内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美国政府坚持“长臂管辖”原则，要求对为美国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查；而中国政府则坚持“完全信任”原则，拒绝让渡管辖权。这是由两国在审计底稿调取方面的法律差异、对于“主权”问题的态度差异以及对于跨境审计监管的需求差异导致的。对此，建议：（1）为美国监管机构设立有效的审计底稿调取通道；（2）加快审计监管改革，争取获得互信委托认可；（3）对企业海外上市，在降低门槛的同时加强监管。

有学者就注册会计师行业2009年以后主要监管制度的变迁与审计师声誉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行业个人职业道德守则制度的变迁和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变迁，都显著促进了事务所审计师声誉的提高。

有学者就审计师参与新股发行审核影响IPO审计市场竞争的机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事务所的IPO审计市场占有率与会计事务所是否有审计师担任本届发审委委员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而与会计事务所中曾担任发审委委员的审计师人数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审计师参与新股发行审核更可能通过知识溢出效应而非寻租效应影响IPO审计市场的竞争。

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是保险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签定的契约，保护对象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委托者及利害关系方，然而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有学者以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的目的为导向，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不同组织形式，从委托人、会计师事务所、保险公司和政府等方面探讨了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有学者研究了国际审计准则第五号对于审计报告时滞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AS2，AS5的颁布显著减少了审计报告时滞。这说明风险导向审计确实提高了审计效率，进而减少了审计报告时滞。进一步来说，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显著增加了审计报告时滞。这是因为内部控制缺陷表明企业中可能存在较高的风险，使得注册会计师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与时间，因此审计报告时滞更长。

有学者就不同的制度化水平下,会计师事务所的政治关联与经营业绩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政治关联的影响中,市县级政治关联对事务所的影响较为突出,但是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较高级别的政治关联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开始变得显著;(2)在制度环境分析中,市场化和法治水平本身与经营业绩正相关,其交叉项与经营业绩负相关,行政干预与经营业绩负相关。

有学者以特易购财务造假案件作为研究对象,从审计风险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是否应该定期轮换会计事务所。研究发现:由于普华永道与特易购的长期合作,普华永道每年采用相同的审计程序,使得财务人员根据事务所的审计程序巧妙地设计了一系列的造假手段来规避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同时,长期的合作使得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有更多的疏忽,合作审计程序常年不变导致忽略公司内部环境的变化,从而出现审计失败。由此,提出应该建立会计事务所轮换制的观点。

(七)政府审计研究。

有学者基于行政权力制衡视角研究了我国国家审计信息需求。国家审计信息的范围应包括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的4项权力,以及与此相对应的4类责任,全面反映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的活动范围。同时,针对每一项权力和每一类责任,都应全面反映决策活动、执行活动。国家审计信息的结构特征包括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可靠性,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经济活动的适当性、有效性。在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行政运行机制下,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都是国家审计信息的需求者,国家审计是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的信息支持系统。

有学者研究了制度环境、政府间竞争对地方审计机关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地方审计机关效率存在空间依赖;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地方审计机关纯技术效率越低;制度环境对国家审计治理功效发挥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地方政府间竞争损害了地方审计机关效率,竞争越激烈,地方审计机关效率越低。研究还发现审计人员相对工资、信息化水平等因素也对地方审计机关效率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就双重领导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越强的地区,审计发现的问题也就越多,但与审计执行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被审计单位对于各项规章制度的遵从度越高的地区,审计发现的问题也就越少,审计执行结果也同样越好。

有学者研究了国家审计对内部审计资源的利用和风险防范问题。指出:审计资源的整合利用发生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往往面临不同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挑战,存在一定的审计风险。因此,国家审计需要构建一套有效防范审计风险的内部审计资源利用路径,促进资源整合,提高资源协同效果。

有学者从法治精神的视角,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审计理论创新发展的4方面建议:(1)拓展遵循性审计的内涵和外延,推动遵从规则的社会文化的培育形成;(2)加强对构建

以权力监控为重心的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促进公共经济权力的阳光运行;(3)重视和加强民生审计问题研究,维护好民众的合法权益;(4)加强制度合理性审计的研究,推动审计质量的持续改进与提高。

有学者对国家审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职能作用进行研究。指出:为充分发挥好国家审计的基石和保障作用,当前应加快完善审计制度,重点是要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进一步完善审计体制机制,推进审计职业化建设,切实提高审计能力。

有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分析了国家审计人员职业道德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并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审计人员签署廉政承诺书的频率、违反审计职业道德受到处罚力度与审计职业道德违背负相关,岗位轮换时间与审计职业道德违背成正U形关系;(2)审计业务复杂度增加,审计机关人员签署廉政承诺书对职业道德违背的抑制作用加强,审计轮换时间与审计职业道德违背的正U形关系更显著,而处罚力度对审计职业道德违背的抑制作用无显著差异。

十、公司治理研究

(一)董事会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对董事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董事会当中非执行董事和执行董事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随着非执行董事比例的增大,执行董事的比例相应减小,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管理层和股东的力量对比。非执行董事的比例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说明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很可能是因为控股股东和其他重要影响的股东安插代表其利益的非执行董事造成的。

有学者就公司CEO过度自信行为与频繁发生的并购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并购决策与CEO过度自信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以及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加时,可以削弱CEO过度自信而做出的低效率的并购决策,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以及董事会规模则没有表现出这种治理作用。

有学者就董事的独立性与债务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信用状况较好并且债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董事会的独立性能够降低债务成本,当信用状况较差并且债务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董事会的独立性会增加公司的债务成本。独立董事制定的公司政策会增加公司的风险。独立董事代表股东的利益制定公司政策,并且随着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代理冲突的增加,董事会的独立性会增加债务成本。

有学者就非控股股东董事和独立董事谁是更积极的监督者进行研究发现:相比控股股东董事和内部董事,非控股股东董事更有可能投非赞成票,而独立董事更不可能投非赞成票;非控股股东董事在业绩差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有可能投非赞成票,独立董事在业绩差的企业中更有可能投非赞成票,但在国有企业中更不可能投非赞成票。

有学者就独立董事的“逆淘汰”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被独立董事提出质疑的上市公司群体中,“逆淘汰”效应非常严重,尽职独立董事离职概率显著较高,并且其继任者

的独立性和声誉水平较低。独立董事人力资本市场对这种局部上市公司的“逆淘汰”效应并未给予纠正,反而在更大范围内加剧了“逆淘汰”,尽职尽责独立董事随后获得其他公司独立董事的职位数显著低于未尽职尽责独立董事,这也说明独立董事市场缺乏有效的声誉奖惩机制。

有学者就在那些会计准则不是特别严格的领域中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是否依然会保护股东利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任期越长的公司分类转移程度越低;董事会中包含在其它公司担任CEO的董事数量越多,公司分类转移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中专家成员越多、任期越长则经常性费用误分类程度越低;委员会中在其他公司担任CEO或其他职务的人数越多则分类转移程度越高。

(二)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股权激励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实际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呈现出区间效应,且在管理者持股比例达到8.58%时绩效评分最高,而民营企业的股权激励则表现为管理者防御效应,即企业绩效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加而降低,即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有利于国有企业发展,并应适当削减民企管理者的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国企并不显著,而在民企中显著为正。

有学者就管理者任期、晋升激励与多元化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晋升对多元化决策有一定抑制作用。随着既有任期的增加,管理者对晋升激励的敏感性以及晋升激励对多元化决策的抑制作用都会增强。但管理者对晋升激励的敏感性以及晋升激励对多元化决策的抑制作用并不受其预期任期的影响。

(三)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是否可以提升公司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自然人直接持股的公司比金字塔结构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业绩与市场业绩。直接持股公司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概率更低,实际控制人更愿意长期经营;大股东占款比例与关联担保发生概率更低,大股东侵占减少;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能够激励其更加关注公司业绩及市场价值。

有学者就基金控制权的缺失、基金控制权构建、委托代理冲突下控制权的重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大股东相对控股的情形下,当大股东和管理层发生委托代理冲突时,社会资本控制权的稳定性受到冲击,基金会权衡大股东权利和管理层权利的强弱,选择支持最有利于其实现控制权的一方。

有学者就我国民营上市公司CEO持股能否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产生一定抑制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CEO持股能够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抑制作用;随着持股比例增加,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面,CEO持股并未表现出堑壕效应,且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支持了CEO持股的协同效应;董事长与CEO二职兼任能够进一步抑制民营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长期业绩会带来更为不利的影响,

而CEO持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长期业绩的损害。

(四)大股东控制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大股东资金占用与管理人员变更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资金占用对管理层变更的影响在经济意义上是显著且重要的,大股东的资金占用对管理层人员的薪酬水平、薪酬业绩敏感性以及公司业绩方面的负面影响,会激化与管理层团队的冲突,引发管理层变更。

有学者就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并提升了公司业绩。并且当大股东退出对控股股东财富的影响更大(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退出更可信(持股比例相对于控股股东更少)以及处于对控股股东外部约束更差的环境下(法律保护较差地区和非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更为有效。

有学者就公司治理是如何影响大股东的投资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与重大股权总额之间显著正相关,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公司治理的变化会影响重大股权的变化;将大股东分为不同类型,公司治理只影响机构投资者;“董事会构成和独立性”是唯一影响重大股权总额的分指数;不同类型的大股东对于不同的公司治理偏好不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更偏好优质的问责制和审计,其他机构投资者更偏好良好的董事会构成和独立性;公司治理和重大股权变化之间的关系由金融危机之前的不显著到金融危机期间的显著,表明了大股东相信在财务困境时期公司治理是特别重要的。总之,公司治理的提高,尤其是董事会构成和独立性方面的提高,会吸引更多的大股东。

(五)公司治理、公司绩效与市场反应。

有学者就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支持了“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但不支持“更多掏空效应”;大股东持股同时通过“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有学者就公司治理状况对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牛市和熊市中的公司治理收益完全相反,牛市中出现正的公司治理收益,熊市中公司治理收益却为负;(2)治理机制相对完善的公司的管理层在牛市和熊市中都会更加积极地承担风险;(3)公司治理所激发的管理层风险承担行为与牛熊市中存在不同的风险-收益关系共同导致了牛熊市中公司治理收益完全相反的结果。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经理人自利动机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经营绩效水平下,经理人自利动机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绩效好的上市公司所拥有的自由现金流要高于绩效较差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较差的公司的固定性货币薪酬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经营绩效较好的公司中,管理层任期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经营绩效较差的公司中,管理层任期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经营绩效较好的公司中,两职分离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有学者就创业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创业投资参与的国有、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均明显高于没有创业投资参与的国有、民营企业；(2)风险资本能够改变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但创业投资并未明显改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3)在创业投资参与的民营企业中，创业投资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但增强了高管薪酬与市场业绩之间的敏感性。

(六)管理控制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中小股东异议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于改聘前收到不利审计意见的公司，中小股东异议的出现显著加强了公司在改聘后继续收到不利审计意见的概率，即后任审计师基于中小股东异议做出了更加谨慎的反应。尽管中小股东“用手投票”不能改变议案的通过结果，但有可能引发外部监督力量的关注，从而发挥一定的间接治理效应。

有学者就企业特征与公司治理机制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度负向调节创业导向企业的成长性，而激励型公司治理机制，如股权激励对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能够促进创业导向企业的高成长。激励型与监督型的公司治理机制在创业导向企业的特定情境下，有不同的作用方向。企业创业导向的定位是决定不同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重要变量。

有学者就高管职务消费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不能提升企业业绩，但是非国有企业的高管职务消费能显著提升企业业绩；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高管职务消费均不能提升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不同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高管职务消费能显著增加企业获取的政府补贴；对高管职务消费的监管和规范不能简单地采用“一刀切”的方式。

有学者就高管团队权利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显著正相关；(2)权力不平等与任务型断层强度显著正相关；(3)任务型断层强度和任务型子群体不均衡性均能够提升企业创新强度；(4)任务型断层强度完全中介了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5)任务型子群体具有不均衡性的调节作用。

有学者就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程度角度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程度与企业债务融资水平成负相关关系；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地区的家族管理企业和家族股权控制程度较强的家族管理企业对高杠杆债务融资的抑制作用会更加显著。

有学者就公司治理、经营效率和企业内部控制实施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独立董事比例、企业内部控制实施、企业规模、公司高管薪酬与银行经营效率呈正相关关系，而董事会成员任期、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持股数量、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的关联性与银行经营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外

部审计依赖性与内部控制实施呈相互替代关系。

(七)信息披露、媒体监督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媒体治理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位于媒体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时，其过度投资水平较低，这意味着媒体治理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行为。当公司内部治理效率较低时，媒体治理与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增强，这意味着内部治理或正式机制失效时，外部监督和非正式机制发挥了重要的替代作用。

有学者就受到政治影响的公司，在较为敏感的政治事件时期，会不会存在压制不利消息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管是国有还是非国有的上市公司，在政治事件结束之前，消极的股票回报偏差都有所减少；而在政治事件过后消极的股票回报偏差都有所增加。除非从政人员有着很强的政治仕途考虑，否则省份经济的发展将不能缓解压制坏消息的现状。

有学者就官员视察活动对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和媒体关注对官员视察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官员视察活动对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影响因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政府官员级别的不同存在差异；(2)考虑了媒体的监督作用后，负面媒体报道会显著减少官员视察活动为企业带来的政府补助，而非负面媒体报道则没有影响；(3)政府补助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作用因有无官员视察呈现差异，即对于受到官员视察的企业而言，政府补助的经济效果要弱得多。

有学者对母子公司信息披露方面进行研究发现：子公司处于母子公司资本控制链的位置显著影响其信息披露；母公司控制强度、子公司自主性在子公司处于资本控制链的位置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中发挥部分调节作用，并且二者存在对立性调节效应；母公司控制强度、子公司自主性的调节效应在实际控制人为民营股份的母子公司中显著强于实际控制人为国有股份的母子公司。

有学者就强制型社会责任披露与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被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的公司，在披露后投资效率显著提升。其中，在过度投资情境下尤为明显，但在投资不足情境下没有显著变化。在财务信息质量较差、所处区域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被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的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八)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对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单一因素(留存国有股控制或管政治关联)带来的政策性负担效应和政治依附效应损害了企业投资效率；而双重因素(留存国有股控制和高管政治关联)缓解了单一因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

有学者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公司治理进行探讨。针对新时期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以下构想：(1)股权结构：基于不同的功能和目标将国有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公益性企业，该类企业应确保国有股份占主导地位，少数非公有资本参与；第二类是功能性企业，国有资本应保持相对控股地位，可竞争性环节对非公有资

本开放；第三类是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竞争性企业，股权结构应让市场决定。(2)公司治理结构：需明确董事会在决定经理人员选聘和薪酬事项、评估公司和经理人绩效及重大事项决策方面的职责权限；非公有资本股权不占优势的董事会构成中，增加非公有资本代表所占的数量和比例；在监事会中引入专职人员担任监事。(3)治理机制：企业人员的获利与企业的短期、长远效益相联系，并接受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契约的约束；在内部建立绩效评价方法，在外部发挥市场评价机制的作用；在内部和外部建立信息披露机制提高管理透明度；理清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职责范围，接受国资委、债权人、媒体的监督。

(九)其他相关研究。

有学者就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价值是否有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税收规避不会增加现金持有价值。公司治理机制在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中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有学者就机构投资者对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偏好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公司治理对于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敏感性的影响实际上很小，只有10%的机构投资者表现出较高的公司治理敏感性；(2)较高的公司治理敏感性是因为机构投资者积极地参与了公司治理，而不是因为机构投资者投资了公司治理较好的公司；(3)规模较大、偏好增长型投资组合的机构投资者更关注公司治理；(4)普通衡量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敏感性的指标存在着衡量偏误。

有学者就异地独董能否提高并购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主并公司拥有异地独董时，异地并购的效率显著更高，具体表现为异地并购宣告时更高的股东财富效应、异地并购开展后更短的完成时间以及异地并购完成后更优的整合效应。当目标公司所处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程度越严重时，这种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地关系网络是现阶段异地独董发挥咨询功能的主要途径。异地独董只在民企的异地并购中发挥了咨询作用，没有提高国企的异地并购效率。

有学者就公司高管婚变的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高管婚变直接降低了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改变了股东的排位顺序，进而影响离婚高管在公司的地位、职位，引起公

司董事的变动，并可能造成大客户的流失；(2)市场对高管婚变的短期反应偏负面，在离婚为市场所知后第一天，平均非正常收益为-0.75%，随后坏消息逐渐被市场消化；(3)高管婚变对公司的绩效有着深刻的影响，高管离婚后公司盈利能力下降、股票估值水平下降、股票波动加剧、资本支出减少、负债水平降低；(4)高管婚变的经济后果因高管的特征以及离婚交易安排而异。

有学者研究银行融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表明：银行的效率对公司治理至关重要，无效的贷款分配策略不仅无法有效监测企业质量，而且会淡化资本市场的监督作用。从本质上讲，如果金融系统由非效率的银行主导，那资本市场将很难走向成熟。

有学者就公司治理监管环境下合规对治理有效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治理合规对治理有效性的提升作用未充分体现；强制性治理合规对风险控制有效性和经营有效性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自主性治理合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经营有效性方面。两类治理合规行为在影响特定治理有效性时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

有学者就公司年度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度量，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以及公司财务特征等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提高所在行业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审计师的行业专长也有利于提高被审计公司与行业内其他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更低；盈余波动性、公司规模、负债比率均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显著负相关；盈利能力和账面市值比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独立董事比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不显著。

有学者研究对冲基金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冲基金所有权可以提高专利数量和质量。当对冲基金在公司持股较多和当对冲基金所有权占公司总资产比例较大时，这种积极影响会更强烈。这对关于对冲基金所有权的影响的文献作出一定贡献，且确定了对冲基金可能创造股东价值的另一个渠道，为对冲基金所有权在企业投资决策和股东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作出了新的阐述。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供稿 王隼华

陈梅 袁克利执笔)

2015年政府会计理论研究观点述要

一、关于政府会计准则理论研究

财政部2014年2月发布《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征

求意见稿)》，2015年10月正式颁布《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基本准则》)，统驭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概念框架搭建完成，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进程中具有重要的